

宋元理學家讀書法與「唐宋八大家」 的經典化

胡 琦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研究助理教授

一、引言：經典的架構

倘若要瞭解一位文人的學問淵源、文章趣味，一種直接而親切的方法，或許就是步入其書房，窺覽其鄴架縹緗乃至枕中秘笈。明清之際，黃宗羲便生動地記述了他在錢謙益書齋中的見聞：

拂水時，只言韓、歐乃文章之六經也，見其架上八家之文，以作法分類，如直序，如議論，如單序一事，如提綱而列目，亦不過十餘門。¹

錢牧齋奉韓愈、歐陽修為「文章之六經」，乃是以「唐宋八大家」為文章正典。有趣的是，拂水山莊書齋中插架琳瑯的「八家之文」，並非按韓、柳、歐、蘇等作家逐次排列，而是以作法分門，形成一種自有機杼的文章分類體系。黃宗羲所見者，或是拆散改裝的舊刻，或是重新分門抄錄的寫本，可能還只是部居別聚的零篇散簡，也可能已經匯纂成為一部完整的古文總集。其分類細目，今已不易考知，但《思舊錄》的記述卻能提醒現代的讀者：「唐宋八大家」這一古文典範譜

本文係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 2017-18”的階段性成果。文章是在業師張健教授的啟發與指導下寫成；初稿曾先後於荷蘭萊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組織的研討會上宣讀，蒙翟志成、張宏生、陳雯怡、傅君勳、王昌偉、方笑一諸先生指點匡正；修改過程中，尤其受惠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編委會及兩位匿名審查人鞭闢入裏的評審意見，以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編輯王福楨先生的細心校正，謹此一併致謝。

¹ [清]黃宗羲：《思舊錄》，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26冊，總頁58。

系，其內部之系統框架，本有多元之可能：在「作家」之外，「文體」或是「作法」，都是可能存在的結構。

文本「經典化」過程中的閱讀與寫作行爲，亦可能潛藏著複雜多元的面向。在文學經典化的研究中，「選本」是一個重要的視角²。以唐宋古文而言，乾隆年間之《四庫全書總目》已是從選本的角度考察「八大家」之淵源，指出明初朱右輯有《八先生文集》，「八家之目實權輿於此」³；至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遂「爲世所傳習」⁴。近年日本學者高津孝在其〈論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一文中，更梳理出從《古文關鍵》、《宋文鑒》、《崇古文訣》、《文章軌範》、《文章正宗》、《續文章正宗》一直到乾隆《御選唐宋文醇》的脈絡，對「唐宋八大家」形成的歷史過程作了甚爲精當的說明⁵。鍾志偉、付瓊則對明清時期的唐宋八家選本進行了詳實的考察和研究，展現出唐宋古文正典在近世流傳和演變的複雜面向⁶。不過，已有的研究大多是討論韓愈、柳宗元、蘇軾等作家如何逐個「權威化」。唐宋古文經典譜系按照何種形式組織起來？這一譜系內部的分類方式如何形成？這一問題似未得到學界的充分關注。

事實上，考察知識／文章分類結構的形成，對我們更深入地認識唐宋古文經典譜系的觀念基礎，或能有所啓發。如《四庫總目》所論選本，《文編》以文體

² 一九三〇年代，魯迅便已指出「評選的本子，影響於後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還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提醒「這許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們也該留意的罷」。魯迅：〈選本〉，《集外集》，《魯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137。該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北平《文學季刊》創刊號，署名唐俟。

³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169〈《白雲彙》提要〉，頁1468上。

⁴ 同前註，卷189〈《唐宋八大家文鈔》提要〉，頁1718下。

⁵ 高津孝〈論唐宋八大家的成立〉，原載《首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後收入高津孝著，潘世聖等譯：《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7-51。此前，高步瀛選注《唐宋文舉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上冊，頁1）已云：「考八家之選，始於宋呂東萊《文章關鍵》〔按：應作《古文關鍵》〕。」吳承學〈評點之興——文學評點的形成和南宋的詩文評點〉（《文學評論》1995年第1期，頁24-33）亦提及《古文關鍵》對後來「唐宋八大家」形成的影響。黃強〈朱右及其《唐宋六家文衡》述考〉（《文學遺產》2001年第6期，頁131-134）圍繞朱右的選本，對唐宋八家之形成亦有論述，可參看。

⁶ 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選本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付瓊：《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考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爲類⁷，朱右、茅坤之書則以作家爲次。高津孝所論的古文入門書中，《古文關鍵》、《崇古文訣》以時代作者爲次；《文章軌範》按手法分「放膽文」、「小心文」兩大類；《續文章正宗》本《文章正宗》而略加變化，分爲「論理」、「敘事」、「論事」三門；分類方式各不相同。換言之，在「唐宋八大家」這一經典譜系的形成過程中，除了作家的進退升降，知識架構也存在多元的可能。我們需要反思的，不僅僅是典範作家如何被選擇進入或退出古文之正典譜系，更是「大家」本身作爲一種知識分類的系統如何得以成立？如果就「八大家」經典譜系的發展成熟而言，明清時期唐宋派古文家固當是其重心；不過，「八大家」譜系在明初朱右既已基本確定，倘欲考其深層背景，便不能不上溯到更早的宋元時期，索求其觀念因緣。不僅如此，從知識結構的角度考察古文經典化，就不能僅僅停留在文章領域內部述論其「實然」，更必須將還原到整個時代思想、制度的大背景中，追問其「所以然」。古人爲學之大體，本自融貫今人所謂「文學」、「哲學」、「經學」諸端，其知識結構也處在這一多方互動的歷史語境之中。因此，回到儒學本身的脈絡中討論「古文」觀念問題，就顯得尤爲必要。本文希望以「唐宋八大家」這一經典譜系爲例，嘗試尋繹出經典化早期階段的幾個重要觀念要素，進而探討文章典範與士人整體思想世界的關係，並反思「古文」在整個思想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二、先與後：理學家對文章工夫的討論

將「八大家」經典化的觀念，事實上在宋人的論述中已經頗爲多見⁸，而其中尤可注意的是，在學術思想史上常常被視爲「古文家」之對立面的理學士人，也有學習韓、柳之說。理學家對文章一道，基本的態度是「文者道之枝葉」，因此，在其工夫論之中，最重要的是「尊德性」的道德工夫⁹，至於「作文章」，

⁷ 唐順之《文編》，選文自周迄宋，嚴格說並非專門的「唐宋古文」選本。其具體分類爲：制策、對、諫疏、論疏、疏請、疏、疏議、封事、表、奏、上書、說、劄子、狀、論、年表、論斷、論、議、雜著、策、辭命、書、啓、狀、序、記、神道碑、碑銘、墓誌銘、墓表、傳、行狀、祭文。〔明〕唐順之編：《文編》（嘉靖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網址：[https://iif.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9554455\\$1i](https://iif.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9554455$1i)，檢索日期：2018年3月14日。

⁸ 參高津孝著，潘世聖譯：〈論唐宋八大家的成立〉。

⁹ 工夫論向爲宋明理學研究之大端，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68-1969

則頗有玩物喪志之虞。不過，從「道問學」的立場來看，做文章需要讀書，可以與於學問之一端；因此韓愈、蘇洵等前代文章家的學文心得，也被理學家吸收到其為學工夫論之中¹⁰。文章工夫論在士人中本有其傳統，從北宋末年開始，韓、柳、歐、蘇之文便漸成文章習學的典範。政和三年(1113)四月，呂本中為其表弟趙承國備述「為學之道」云：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得此理。¹¹

年)中認為自律道德是本質工夫，乃是儒學正統，程頤、朱熹開出道問學一路，並非本質工夫，而是助緣。鍾彩鈞〈朱子學派尊德性道問學問題研究〉(收入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3年]，頁1273-1299)則轉而站在道問學的立場，對朱熹及其後學的道問學工夫有精到的分析。近年學界的研究的側重在靜坐、養氣、體證等身心修養工夫方面，參見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此種進路也正好符合理學重視身心、道德修養的觀念。不過，在另一方面，讀書學文，一方面是學問工夫，另一方面也是修齊治平實踐的重要部分，當是理學家思想與實踐體系中頗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已有的研究常常從教育思想的角度研討之，如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Chu Hsi's Aims as an Educator," 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ed.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86-218; 李弘祺：《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事實上，關於讀書、作文工夫的討論，可以視為「道問學」觀念在不同領域、層次的顯現，也應納入理學工夫論的體系之中加以探討。

¹⁰ 有關理學讀書法，現代學界已有不少研究，如錢穆《朱子學新學案》即將「朱子的讀書法」列為專節；余英時〈怎樣讀中國書〉(《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頁261-268)也特別強調朱熹讀書法對傳統學術的意義。近年的研究如陳立勝〈朱子讀書法：詮釋與詮釋之外〉(《「身體」與「詮釋」——宋明儒學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頁191-228)、王雪卿〈讀書如何成為一種工夫——朱子讀書法〉(《靜坐、讀書與身體：理學工夫論之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5年]，頁45-104)都對朱熹的讀書法做了深入細緻的分析，可以參考。戴聯斌的博士論文Lianbin Dai, *Books, Reading and Knowledge in Ming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2)則對朱熹讀書法對明人閱讀行為的影響作了開拓性的研究。但學界已有的研究，主要都是在理學內部討論讀書與經典詮釋的問題。事實上，不論從其起源或是流傳影響上看，理學家的讀書法都與文章之學有密切的關聯。張健《知識與抒情：宋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揭櫫讀書工夫論與詩學工夫論的淵源關係，並特別舉出黃庭堅與朱熹作為其中關鍵的例證，見該書第五章〈渾成境界與昆蟲工夫〉(頁250-282)。

¹¹ 《耆舊續聞》卷二引呂氏帖，見[宋]陳鵠著，鄭世剛點校：《西塘集耆舊續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2。朱剛〈呂本中〈政和三年帖〉的批評史意義〉(《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五章第四節，頁393-412)特別揭出此帖，認其確立了歐、蘇文和蘇、黃詩的典範地位，並且可

是標舉「工夫」以言詩文之習學，分別奉蘇軾、黃庭堅為文、詩之宗師。具體而言，文、詩之「工夫」又分別有一系列作家作為取法對象，如云「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更考古人用意下句處」；「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過人」等等¹²。呂本中為趙承國所書的這一〈政和三年帖〉，乃是後來編寫《童蒙訓》一書之前身¹³；本中之從孫呂祖謙編選《古文關鍵》，卷首〈看古文要法〉稱「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遍考古人用意下句處」¹⁴，正是直接承襲〈政和三年帖〉之語。不僅如此，朱熹在致呂祖謙書中提到「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¹⁵；又嘗向弟子稱道呂氏家族抄寫注疏，親手點注的讀書之法¹⁶，可見呂氏有關讀書習文學之論說在南宋士人中的流行。《朱子語類》將「論文」之語輯為兩卷，可以集中考見朱熹對「文章工夫」的討論。如：

問「舍弟序子文字如何進工夫」云云。曰：「看得韓文熟。」

因論今日舉業不佳，曰：「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請斫取老僧頭去。」¹⁷

由此可見，朱子論文章工夫，在現實層面乃有舉業方面的關懷；另一方面，在觀念上，文章工夫又可以作為「格物」之一端而獲得正當性。朱子為《大學》之「格致」作補傳，以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以《大學》始教，必使

以作為八大家作品被經典化的「後『古文運動』時代」之開始，其說甚當。

¹² 陳鵠著，鄭世剛點校：《西塘集耆舊續聞》，卷2，頁13。

¹³ 郭紹虞：《宋詩話輯佚·童蒙詩訓》（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604案語。

¹⁴ [宋]呂祖謙撰，王宜瑗點校：《古文關鍵·看古文要法》，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冊，頁234。

¹⁵ [宋]朱熹：〈答呂伯恭〉，《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1冊，頁1429。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頁73-74）將此書繫於乾道六年（1170）。可知朱熹所見《童蒙訓》，載有論詩、論文之語；而今所見《四庫全書》本《童蒙訓》三卷，不載上引〈政和三年帖〉中論學詩、學文之語，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二〈《童蒙訓》提要〉推測係後人刪削：「殆洛蜀之黨既分，傳是書者輕詞章而重道學，不欲以眉山緒論錯雜其間，遂刊除其論文之語，定為此本歟？」（頁779中）

¹⁶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0〈讀書法上〉，頁175。並參張素卿〈「評點」的解釋類型——從儒者標抹讀經到經書評點的側面考察〉（收入鄭吉雄、張寶三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86-99）對呂祖謙家學傳承讀書法以及朱熹讀書法的討論。

¹⁷ 以上二則，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139〈論文上〉，頁3320-3321。

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¹⁸。按照此種觀念，文章亦天下之一物，也可以作為「格物」之一端——雖然僅是末端而已。因此，相對於程頤之亟言「作文害道」，認為「文亦玩物」因此會「玩物喪志」¹⁹，朱熹對文章的態度便要寬容得多。《四書章句集注》解釋《論語》的「游於藝」云：「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²⁰正可與伊川「玩物喪志」之說並觀。朱子《大學或問》論說窮理，「用力之方」，羅列「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²¹；其中「求之文字之中」，主要是就讀經而言，然施之於學文亦無不可。更微妙的是，作為「本」的窮理，與作為「末」的為文，因為同樣涉及到讀書，在工夫上就有相通之處：

且莫說義理，只如人學做文章，非是只恁地讀前人文字了，便會做得似他底，亦須是下工夫，始造其妙。觀韓文公與李翊書，老蘇與歐陽公書，說他學做文章時，工夫甚麼細密！豈是只恁從冊子上略過，便做得如此文字也！²²

此處朱子闡發曾子「以魯得知」，乃是因為「質鈍」，故「著工夫去看」，接下來使用文章工夫類比義理「工夫」，論述方式背後，正可見其觀念背景。其〈滄洲精舍論學者〉前半抄錄蘇洵〈上歐陽內翰書〉之語，又提及韓愈〈答李翊書〉、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稱道文士的讀書工夫，但又惋惜其但為「作好文章」，未能在道理上有所成就。後半篇則話鋒一轉，提出將蘇洵讀書以學文的工夫用到道學的修養上，「依老蘇法」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如此必能成學²³；正可見為文工夫論與為學工夫論之間的因緣承接²⁴。

¹⁸ 朱熹：《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7。

¹⁹ [宋]程頤、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冊，頁239。

²⁰ 朱熹：《論語集注》，卷4，《四書章句集注》，頁94。

²¹ 朱熹：《大學或問》，《朱子全書》，第6冊，頁527。

²²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39〈《論語二十一·先進篇上·柴也愚章》〉，頁1018 討論「參也魯」時的發揮論述。

²³ 朱熹：《朱子全書》，第24冊，頁3593-3594。

²⁴ 關於朱熹等理學家論理學工夫與文章工夫的深入研究，見張健：《知識與抒情：宋代詩學研究》第六章〈文道關係的再調整〉（頁309-319）以及〈朱子的文章論〉（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十七日於香港：嶺南大學「『文章學理論與批評實踐』暨『史漢研究』國際學

值得注意的是，宋儒對讀書工夫的討論，相對於前輩文人的學文工夫，明顯更突出了先後次第的問題。韓、柳、蘇、黃等文士關於學文經歷的論說，大多是一種橫向、平行的工夫論。如韓愈〈進學解〉所謂「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²⁵，只是大致分開了經書和後世文章；柳宗元「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²⁶，也是分別從不同的著作中學習不同的方面。李廌引述蘇軾之語云：

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²⁷

蘇軾這一段學文之法，從不同的內容和寫作體裁出發，選擇不同的範本，當是頗切實用的安排，但大體還是平行諸端，沒有組織為一套先後井然的讀書程序²⁸。而在呂本中、朱熹等人的討論中，學習的先後次序，便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話題。呂本中〈政和三年帖〉主張先柳後韓：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工夫自見。²⁹

此條並非軒輊韓、柳文章之高下，而是從學習的角度談論工夫的先後。其理據在於柳文法度分明，更易於學習。類似的說法在南宋亦有繼響。《朱子語類》載：

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

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 ²⁵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卷1，頁51。
- ²⁶ [唐]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34，頁543。
- ²⁷ [宋]王正德著，王宜瑗點校：《餘師錄》，卷4，見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第1冊，頁402。
- ²⁸ 例如，是應當先按照不同的文類讀《莊子》、《戰國策》、西漢章疏等作品，抑或應先用工於「熟讀」的經書？又或者，幾種不同的「讀」應當數管齊下，並進不悖？蘇軾並沒有明確的論述。
- ²⁹ 陳鵠著，鄭世剛點校：《西塘集耆舊續聞》，卷2，頁12。

文！³⁰

陳之茂（阜卿）一派主張先學柳、次學韓，觀點與呂本中相同。然而，朱熹之持論卻正好相反，主張先學韓、再學柳。朱子《韓文考異》分別以「闊大」、「精密」概括韓、柳文之特點，也承認柳文「易學」³¹，與呂本中之論並無大異。然而，在學習步驟上，朱熹恰恰不主張先易後難，而是強調要先學氣象正大的韓文，否則先入為主，易使文章氣弱。呂祖謙在《古文關鍵》卷首所載〈看古文要法〉中將文章學習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韓、柳、歐、蘇四家，需要熟看；第二階段「看諸家文法」，包括曾鞏、蘇轍、王安石、張耒、晁補之等等，則屬於博觀。選文數量偏重在前者³²。對於韓柳先後的問題，呂祖謙並未引述其伯祖「先柳後韓」之說，而是用四種風格特色分別提領：

看韓文法：【簡古】一本於經，亦學《孟子》。學韓簡古，不可不學他法度；徒簡古而乏法度，則樸而不文。

看柳文法：【關鍵】出於《國語》。當學他好處，當戒他雄辯。議論文字亦反覆。

看歐文法：【平淡】祖述韓子。議論文字最反覆。學歐平淡，不可不學他淵源；徒平淡而無淵源，則委靡不振。

看蘇文法：【波瀾】出於《戰國策》、《史記》，亦得關鍵法。當學他好處，當戒他不純處。³³

推敲其說，不難發現，呂氏在此潛在又將韓、柳、歐、蘇四家又分成兩個傳統：一是韓愈——歐陽修的傳統，二是柳宗元——蘇軾的傳統。在前者，除了明標歐文「祖述韓子」，更采用了「學……，不可不學……」的相同句式；在後者，呂氏皆用「當學……，當戒……」的句式陳說，又用蘇文「亦得關鍵法」暗示其與被稱為「關鍵」的柳文之間具有淵源。按「關鍵」一語，取譬於門門，喻指

³⁰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139〈論文上〉，頁3320。

³¹ 《朱子語類》載：「先生方修《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見同前註，頁3302-3303。

³² 須熟看的四家，韓愈選十三篇，柳宗元八篇，歐陽修十一篇，蘇洵六篇，蘇軾十六篇，佔百分之八十七；泛覽諸家，僅選了曾鞏四篇，張耒二篇，蘇轍二篇，佔百分之十三，另外王安石、李廌、秦觀、晁補之四家都未選文。可見其用意著重在「熟看」的文章。

³³ 呂祖謙撰，王宜瑗點校：《古文關鍵·看古文要法》，頁235-236。

文章之起轉連接——門戶有關鍵，故能啓閉，文章亦須有關鍵，結構上乃有開闔。轉爲形容詞，妙於「首尾相應」「抑揚開合」的柳文，其風格便可稱爲「關鍵」³⁴。尤可注意者，「關鍵」乃是呂氏命名其書的用詞，以此許柳、蘇，當不無用意。

韓、柳先後的問題，在工夫論的層次，實際上就是先亦步亦趨，摹求法度；抑或先立其大端，追攀氣力的分別。朱熹同樣意識到有法度的文字容易效仿，亦稱許柳宗元善於模仿古作³⁵，但同時又警惕對「節次」、「法度」的過分追求。一方面，文法模式有可能對義理的充分表達造成限制，朱子嘗比較韓、歐、曾三家，認爲「韓不用科段」，「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有「科段」，自然便於行文，但反過來在寫作中容易依賴之，「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³⁶這樣法度反倒成爲了束縛。另一方面，過度追求精密，在文章審美的層次上，容易缺乏奇偉矯健之氣而顯得衰弱。在〈看古文要法〉中被推爲柳文所自出的《國語》，在朱熹眼中便不免「說得絮，只是氣衰」。這大概是他主張先學韓愈，以免「衰了文字」的理由所在³⁷。

³⁴ 〈看古文要法〉又舉出四步「第一看大概、主張」、「第二看文勢、規模」、「第三看綱目、關鍵」、「第四看警策、句法」說明具體看每一篇文章的方法。其中「第三看綱目、關鍵」的解釋是「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叙次第，如何是抑揚開闔處」（同前註，頁234），可爲解讀「關鍵」具體涵義之助。羅書華〈從文道到意法：呂祖謙與散文學史的重要轉折——兼說《古文關鍵》之「關鍵」的含義〉（《中國文學研究》2013年第3期，頁72-76、97）詳細討論了「關鍵」一詞的含義，可以參考。羅氏認爲，《古文關鍵》以「關鍵」爲名，可以解釋爲「文法」，又可以進一步細緻理解爲「特指篇章的結構連接、起承轉合」，其說可從。不過，呂祖謙何以特別用作爲書名的「關鍵」指稱柳文，羅文並未論及。

³⁵ 如「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夷〕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兩條分別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139，頁3306、3303。

³⁶ 同前註，頁3320。類似的說法又如：「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見同上書，頁3306。

³⁷ 另外，駢儷、對偶之出現，就被視爲衰弱的表現：「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見同前註，頁3298）。同理，講求對偶的時文也有衰弱之弊，「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腳，三句題也要立兩腳，這是多少衰氣！」（同上書，頁3322）。

對學韓、學柳孰先孰後，朱、呂之具體意見並不相同，但這種對先後次序的關注，實質上開啓了一種縱向的工夫論體系。縱向的學文次第，在觀念上當源於理學家下學上達，循序漸進的為學路徑。在程序上又與程朱所提倡的先《四書》、後六經，先經、後史的讀書次第互為同構，正可見宋人思想世界中學問工夫與文章工夫的相互交涉。朱子〈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云：

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³⁸

在經書之中，特別選出《四書》作為儒道之「大指要歸」、講學之急務，正是這種觀念最顯著的體現。對《四書》的重視，恰恰就是通過其在讀書次第上的優先性上體現出來³⁹。這一辨別難易、遠近、大小的思路，同樣理學家被應用到文章工夫之上。

具體而言，縱向的學文工夫論，又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層次：其一是現實方法上讀書的先後緩急之次序，其二則是歷史上不同作家之間的習學關係所構成的譜系。在理學家的思路中，這兩者恰恰又有關聯——按照前代作家的繼承關係一路讀下來，便是「工夫從上做下」。《朱子語類》中拈出「須取一本西漢文與韓文、歐陽文、南豐文」，又稱韓文高，歐文可學，曾文太迫，正非隨意道及，而是從習學的角度勾勒古文譜系。歐陽修於韓愈之仿效、繼承關係，每為南宋學人所樂道，如陳善《捫蝨新話》便特別討論「歐公作文擬韓文」：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輒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史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做其句讀而已。⁴⁰

陳善以具體的文本對照，論證歐之學韓，所謂「步驟馳騁」，大抵可以相當於呂祖謙所謂的「關鍵」「開闔」；不特如此，陳氏更貶斥由皇甫持正、來無擇一系

³⁸ 朱熹：《朱子全書》，第24冊，頁3895。

³⁹ 關於朱子讀書法與《四書》在經學中核心地位的確立，可參佐野公治著，張文朝、莊兵譯，林慶彰校訂：《〈四書〉學史的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年），尤其是〈序章〉。

⁴⁰ [宋]陳善：《捫蝨新話·上集》，卷1，見[宋]俞鼎孫、俞經輯：《儒學警悟》（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百部叢書集成》第1輯），卷32，頁7a。

師弟傳承而得韓愈文統的孫樵，認為其文「牽強僻澀，氣象絕不類韓作」，反襯歐公之隔世知音⁴¹。「文統」之授受，正當取決於文法、氣象之有得與否，而不盡在乎現實的人際交游。朱熹弟子陳淳在寫給友人的論學書信中，亦特別點出「歐陽之文，步驟最學韓」⁴²，同樣是從文章「步驟」這個角度論述韓、歐之間的承繼關係。歐文一面是上接韓愈，一面又下啓曾鞏。朱熹喜好南豐文，又常常合論歐、曾之文，如云「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等等，潛在都是將曾作為歐的繼承者來進行比照；而他建議鞏仲至在記文寫作上，「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⁴³，則更是明白以歐、曾作為後代文章法度之來源。王柏《魯齋集》中有為《昌黎文粹》《歐曾文粹》兩部古文選本所作跋記，言此二書「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所選」，前者選韓文三十四篇，後者選歐、曾文共四十二篇，王柏稱「觀其擇之之精，信非他人目力所能到」⁴⁴。此類精簡式選本在朱子後學中的流行，正可見朱子文章工夫論的影響。

在韓一歐一曾這一條主線之外，旁及蘇、王及其他作家，唐宋古文家的譜系便漸次成形。葛立方（?-1165）《韻語陽秋》中討論歐陽修〈贈王介甫〉詩中「吏部文章二百年」的公案，引曾鞏致王安石書中「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等語，指出「荊公之文，因子固而投於歐公者甚多」⁴⁵；將王安石牽入韓、歐、

⁴¹ 《捫蝨新話·上集》卷一：「孫樵嘗言自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據其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牽強僻澀，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嫫母捧心，信有之矣！吾嘗謂韓氏之牆數仞，樵輩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見同前註。

⁴² [宋]陳淳〈答徐懋功二〉：「歐陽之文，步驟最學韓，而欠韓之健，不免淺弱而少理致，由其不事性學，無韓之淵源。」《北溪大全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卷34，總頁770下。按陳淳書中云「歷考古今，其文之粹者未有不根本於道，而多駁不純者，皆由是理之不明者也。」乃是主張文章根本於道術，因此站在理學家的立場，認為韓、歐、三蘇在「道」的層面皆成就不足。而「濂溪關洛諸儒宗」，「道體昭明，間有著書遺言一二篇，實與聖經相表裏，為萬世之至文」（總頁771上）。有趣的是，陳淳雖然認為歐陽修的古文成就不如韓愈，是由於他在「性學」方面不如韓；但也同樣會從文章寫作方面論述歐之學韓，梳理韓、歐在「文統」上的繼承關係。

⁴³ 朱熹：〈答鞏仲至〉，《朱子全書》，第23冊，頁3096。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繫於慶元五年（1199）（頁496）。

⁴⁴ [宋]王柏：〈跋昌黎文粹〉、〈跋歐曾文粹〉，《魯齋王文憲公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叢書集成·續編》第132冊，影印《續金華叢書》本），卷11，總頁306上一下。

⁴⁵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宋刻本），卷

曾的傳承譜系之中，還是就現實的師友淵源而論。韓澆 (1159-1224)《澗泉日記》則將師弟交游與文章風格之分析結合起來，如云：

老蘇晚年文字，多用歐陽公宛轉之態，老泉晚年記、序，與〈權〉、〈衡〉諸論，文字不同，豈見歐陽公後有所進耶？其晚年而筆力進歟？⁴⁶

韓澆分析曾鞏文，亦言「曾子固見歐陽公後，自是迥然出諸人之上」⁴⁷；將文風變化，與師友交往結合起來，其說雖未必可為定論，但這種觀察角度卻很值得注意。《朱子語類》中，也有類似之說：

歐公文字數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⁴⁸

朱熹將歐、曾、蘇文合論，正是以曾、蘇皆出於歐，曾得歐之正，而蘇未能盡化也。《語類》又謂曾、蘇作文皆「說得透」而「歐公不盡說」⁴⁹，同樣也是暗示這種源流關係。在這種觀念之下，古文習學的工夫，自然也是以韓、歐、曾為主幹，同時輔以蘇文：

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⁵⁰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

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⁵¹

上引第一條渾言韓、歐、曾、蘇，未見其中次第；第二條則有所區分，《孟子》

18，總頁 239-240。

⁴⁶ [宋]韓澆著，孫菊園點校：《澗泉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下，頁34。

⁴⁷ 同前註。

⁴⁸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139，頁3309。

⁴⁹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同前註，頁3310）

⁵⁰ 朱熹〈答蔡季通〉，《朱子全書》，第22冊，頁1992。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繫於乾道六年（1170）（頁80-81）。

⁵¹ 以上兩條，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139，頁3306、3311。

《史記》、《漢書》是唐宋古文傳統之外「大底文字」；唐宋以來，朱熹以倒敘的方式追出韓、歐、曾這一條主線，此外「儘有好處」的蘇文，「不全好」的柳文，亦可作為文章典範之旁支。尤可措意者，朱熹所言「揀數十篇」「擇之無二百篇」，抄寫下來以供反復精讀的做法，乃是將揀選、熟讀的古文工夫論付諸具體實踐；這與呂祖謙、樓昉等學者編選古文選本的做法實際上是異曲同工——只不過朱熹此處所論是就個人學文而言，不一定要刊印行世而已。

比較韓歐、柳蘇兩系文統，南宋初王十朋亦有此意：「韓、歐之文，粹然一出於正；柳與蘇，好奇而失之駁。至論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韓公欲推遜子厚；歐陽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⁵²不過到了朱熹、呂祖謙，這種論說就演化成爲更嚴密的次第或譜系。呂祖謙《古文關鍵·看古文要法》不但區分韓—歐、柳—蘇兩個傳統，又在汎覽部分繼續延伸北宋文家的譜系：

〔曾文〕專學歐，比歐文露筋骨。

〔子由文〕拘執。

〔王文〕純潔，學王不成，遂無氣焰。

〔李文〕大煩亦麓。

〔秦文〕知常而不知變。

〔張文〕知變而不知常。

〔晁文〕麓率。自秦而下三人皆學蘇者。⁵³

「諸家」之中，曾鞏學歐陽修，蘇轍和「學蘇」（蘇軾）的李廌、秦觀、張耒、晁補之等人都屬於蘇文的系統，正可作前面「熟看」四家之枝葉觀。考鏡流別，本是《詩品》以來傳統文學批評中常見的策略，不過在〈看古文要法〉中，這種流別被融入習學的過程之中，從邏輯上便可以進一步推演：後人學習古文，也可以參考這個譜系來安排自己的學習次第，或學會以參歐、韓，或由「六君子」以深考東坡——前人學文之取徑，亦可作為後代工夫之階梯。

⁵² 王十朋〈讀蘇文〉，末署「紹興庚午七月上澣日讀《東坡大全集》於會趣堂」，可知作於紹興二十年（1150）。見〔宋〕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刊本），前集，卷19，總頁199上。

⁵³ 呂祖謙撰，王宜瑗點校：《古文關鍵·看古文要法》，頁236。

三、科舉之「工程」：元代理學家之讀書法與教育實踐

從北宋末年至南宋，士大夫群體關於讀書、學文之方法門徑頗為關注，除了觀念層面的論述，亦有實踐層面的操作。如呂本中在〈政和三年帖〉中關於詩、文學習步驟的論述，大體上還是一種親友之間的經驗傳承；被寫入《耆舊續聞》等筆記類著述，後來又改寫、結撰成《童蒙訓》一書，便獲得了在士人群體中公開流傳的途徑。朱熹生平與弟子關於讀書、作文的討論，一方面被載入《朱子語類》「學」（包含「讀書法」小目）、「論文」等門類之下，成為理學家學術傳承中的經典話語；另一方面，更被單獨抽取出來，編為《朱子讀書法》一書，流行於世⁵⁴。《朱子語類》中「舉業不佳」等語，已然顯示了理學家論文與科舉的關係；同時，在科舉需求的直接刺激之下，更出現了一種「工程體」的讀書法著作。其較早者，南宋真德秀已編有《應舉工程》一書，針對南宋科場之要求，大體是將時文按內容分為性理、治道、故事、制度四類，又分賦、論、策三種文體，輪次練習；熟悉科場格式之後，「參以古文，如韓、歐、曾、蘇等集，各取明白純粹及近於時文者，與時文閒讀」⁵⁵。王應麟《辭學指南》分「編題」、「作文」、「誦書」、「編文」幾個分安排應舉備考課程，主要則是針對詞科應試所需的設計。如「編題」之部，乃是抄錄經、史、子、集群書之資料，再按天文、地理、政事等知識類別分門排纂以備用⁵⁶；其中便大量引用「東萊先生

⁵⁴ 關於《朱子讀書法》自編成至明代的流傳情況，可參 Lianbin Dai, *Books, Reading and Knowledge in Ming China*。

⁵⁵ 真氏此書今未見傳本。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卷二「作科舉文字之法」題下小注「用西山法」。上欄云「按西山《應舉工程》云，時文有四類，一性理、二治道、三故事、四制度……」，轉引真德秀規劃作文練習日程之語，分別四種知識部類訓練賦、論、策諸體文章，末云「此西山之訓，愚今倣其法，亦以今制三場，分四類輪流編鈔讀作」。可知真德秀已有計日程功以學文應舉的規劃，並撰有專書，惜其未傳，難以知其全貌，唯可藉《讀書分年日程》的轉引窺見一斑。見〔元〕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四部叢刊·續編》），卷2，頁16a-17a。從所涉及的文體看，程端禮所引錄的《應舉工程》文字，乃是針對南宋常科進士而言。王應麟《玉海·辭學指南》中引「西山先生曰」介紹詞科應舉之法，與之對象有別，不知是否來自同一著作（或以《應舉工程》一書而兼常科、詞科；或分別有不同著作）。

⁵⁶ 〔宋〕王應麟：《玉海》（臺北：台灣華文書局，1964年影印後至元三年慶元路儒學刊本），卷二〇一《辭學指南》：「西山先生曰：始須將累舉程文熟讀，要見如何命題用事，如何作文。既識梗槩，然後理會編題。經、史、諸子，悉用徧觀，其間可以出題引用，並隨手抄寫，未須分門，且從頭看，凡可用者，悉抄上冊。……俟諸書悉已抄過，然

曰」、「西山先生曰」，介紹呂祖謙、真德秀的科舉編題之法。「誦書」之部，乃是羅列當讀之書目及閱讀之方法：如引呂祖謙「先擇《史記》、《漢書》、《文選》、韓、柳、歐、蘇、曾、王、陳、張文，雖不能徧讀，且擇其易見、世人所愛者誦之」⁵⁷；引述真德秀對《文選》、《古文苑》以及韓、柳文的選篇等等⁵⁸。《辭學指南》的編纂體例，內容上仍然是以集纂、引錄前人為主，但結構上「編題」、「作文」、「誦書」、「編文」之分部，已經顯現出科舉之學的實踐需求，為文章習學建構起一個技術化的體系。

現存宋元時期文獻中，對古文習學工夫展開論述得最為詳盡者，則當推元儒程端禮(1271-1345)之《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程端禮字敬叔，號畏齋，慶元府（今浙江鄞縣）人，《元史·儒學》有傳，《宋元學案》歸入史蒙卿〈靜清學案〉，蓋其於鄉人尊奉陸學之時，「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達〕用之指」⁵⁹，於朱熹則為四傳弟子也⁶⁰。程氏自稱《分年日程》本於輔廣所輯《朱子讀書法》，「《日程》節目，主朱子教人讀書法六條修；其分年，主朱子『寬筭期限，緊筭課程』之說修。」⁶¹此書對士人進學工夫之規劃，大體上分為讀書、學作文兩個部分。讀書以《性理字訓》、《小學書》始，經書部分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孝經》、《易》、《書》、《詩》、《儀禮》及《禮記》、《周禮》、《春秋》經及《三傳》為序，次復及史部的《通鑑》，集部的韓文、《楚辭》。其間如何背讀正文，玩索註疏，晨溫夜誦，手抄批抹，程氏皆備載其法。從文章工夫論的角度看，《日程》最值得注意的安排，是極為明顯地突出了韓愈文的地位。《讀書分年日程》在「讀書」部

後分為門目。」（卷 201，總頁 3780 上一下）其「門目」乃是按天文、律曆、地理、郡國、宮殿、河渠、鹽鐵、封禪、冕服、音樂、兵書、夷狄朝貢等知識類別，分為數十門，以類編纂。

⁵⁷ 同前註，卷 201，總頁 3786 下。

⁵⁸ 同前註，卷 201，總頁 3787 下—3788 下。

⁵⁹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第 14 冊，卷 190〈儒學二〉，頁 4343。

⁶⁰ [清]黃宗義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 87，頁 2910 全祖望案語。關於程端禮的生平和學術大旨，可參黃漢昌：《程端禮與〈讀書分年日程〉》，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1 年），第 11 編，第 31 冊。

⁶¹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首〈自序〉，頁 10a，及卷 1，頁 1a 開頭小字註語。

分，經書、史書之後就接續安排了「讀韓文」：

先鈔讀西山《文章正宗》內韓文議論、叙事兩體，華實兼者，七十餘篇。要認此兩體分明，後最得力。正以朱子《考異》，表以所廣謝疊山批點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備見。日熟讀一篇或兩篇，亦須百遍成誦，緣一生靠此為作文骨子故也。⁶²

而「學作文」之部則云：

學文之法：讀韓文，法已見前；既知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體矣，然後更看全集有謝疊山批點及選看歐陽公有陳同父選者佳、曾南豐《類藁》、王臨川三家文體，然後知展開閒架之法。緣此三家，俱是步驟韓文，明暢平實，學之則文體純一，庶可望其成一家數文字。……他如柳子厚文先看西山所選叙事、議論，次看全集、蘇明允文，皆不可不看。其餘諸家之文，不須雜看。此是自韓學下來，漸要展開之法。⁶³

在程端禮的古文工夫論中，閱讀前代作品的方式分為「讀」和「看」兩種，兩者程度有別。《讀書分年日程》卷二之首即引史蒙卿之語云：

先師果齋史先生云：書自有當熟讀者，自有當玩讀者，自有當看者，自有當編鈔者。⁶⁴

《日程》中針對經書正文、注疏、性理書、史書等不同類型的書籍，安排有不同等次的讀法。如經書需鈔讀、倍讀，反復玩索，性理書需讀看、玩索，史書則當「看」。具體就古文而言，韓愈文被置於「讀書」之部，地位遠在其他古文作家之上；首先需要精鈔七十餘篇，熟讀成誦，次後再「看」全集；而其他各家只需「看」之即可。應看的作家，根據其與韓愈的淵源關係，又分成兩個系統：一是繼承韓愈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家；二是韓愈系統之外的「他如柳子厚文、蘇明允文」。除了這「六大家」之外，「其餘諸家」，「不須雜看」。《讀書分年日程》的學文工夫以韓愈為核心，柳、蘇為別派，更突出了韓愈的正統地位，而蘇文一派則更被貶抑——尤其是蘇軾，竟未進入《日程》所列舉的古文作家之列。

程端禮對古文經典譜系的確認，直接繼承了朱子重視歐、曾的觀念。這一思想上的淵源關係也可以從《日程》的刊刻板式上得以印證。《日程》每頁分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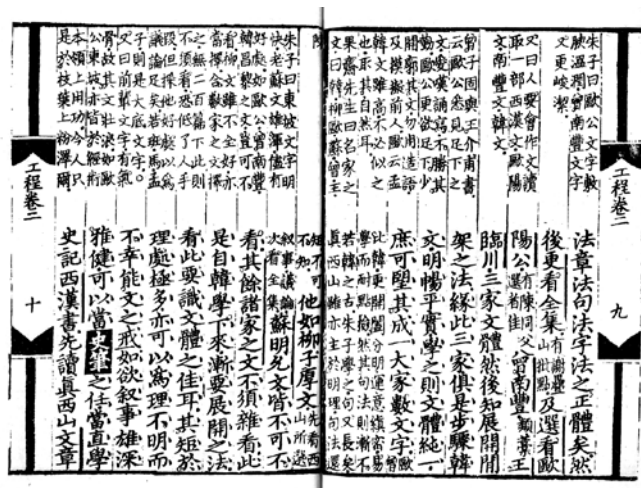
⁶² 同前註，卷2，頁3a-b。

⁶³ 同前註，卷2，頁9a-10a。

⁶⁴ 同前註，卷2，頁1a。

兩欄，下欄為正文，上欄則有雙行小字徵引前人的論述。在「學作文」部分，上欄便臚列了《朱子語類》中關於韓、歐、曾文以及蘇文的論述，顯示其所本（圖一）。

朱熹以歐、曾接韓愈，並未將王安石放入這一譜系。《語類》中提及其文，乃是置於「江西文」這一脈絡之下：「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⁶⁵。這一說法雖然云王氏文章「好」，但其立論的背景乃是為了批評黃庭堅之「求巧」，因此特別在江西作家之中舉出歐、王、曾三人與之形成反襯，並非正面肯定王安石之文。《語類》中另一處比較北宋的文章與道學，即謂「文字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⁶⁶，對王文頗有微辭。綜觀《朱子語類》中論文之語，王文的地位尚不及蘇文。考慮到王氏新學乃程學的對立面，這種立場並不難理解。程端禮將王安石與歐、曾並列為「步驟韓文」的三家，是「八大家」譜系構建過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為了論證此舉的合理性，《日程》上欄特別引用了曾鞏〈與王介甫書〉之語，謂「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以及「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等語⁶⁷，點出歐、曾、王之間商略文法的師友淵源，甚至從模擬的角度更上追孟子、韓愈，正



圖一：《讀書分年日程》卷二「學作文」（取自《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元刊本）

⁶⁵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139，頁 3315。

⁶⁶ 同前註，卷 139，頁 3309。

⁶⁷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 2，頁 9b。

是要強化文章「大家」之間的譜系流傳。程端禮在此綜合了宋儒關於古文大家之間習學關係的諸種論述，如朱熹對韓一歐一曾一系的強調，呂祖謙以王安石文「純潔」之說，以及葛立方關於歐、王、曾關係的論說等等，整合成一個較完整的「學文」譜系。如果從著作的體例上看，此前宋人議論中主要見諸「語錄」式隻言片語的古文工夫論，在這一部元代的專門讀書法著作中，便被編織成一個次第分明、易於實踐的「工程」架構。

程端禮特別強調韓愈在整個古文工夫之中的核心地位，謂士人「一生靠此爲作文骨子」，其地位正相當於《四書》、本經在經學工夫中的地位⁶⁸。所謂「骨子」，一方面是指從韓文中學到的文法，乃是寫作一篇文章的骨架⁶⁹，或者說由句法、章法、篇法等技術構成的文章之「體」；另一方面也喻指韓愈文在整個古文工夫體系中的主幹地位。這種觀念其實也可以在南宋理學家的論說中找到淵源。朱熹嘗論禮樂之教育云：

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皆學一番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⁷⁰

與之同理，程端禮以韓愈文爲「作文骨子」，也是突出韓文在學文過程之中的根基地位，後來的文章工夫，正要在韓文的基礎上展開。因此，在「看文」的階段，首選便是「步驟韓文」的歐、曾、王三家。前文曾經提到，宋人對韓、歐、曾、王、柳、蘇等唐宋古文家之間的因襲關係已經頗有討論；而程氏《分年日

⁶⁸ 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前自十五歲讀《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性理諸書，確守讀書法六條，約用三、四年之功，晝夜專治，無非爲己之實學，而不以一豪計功謀利之心亂之，則敬義立而存養省察之功密，學者終身之大本植矣。」（同前註，卷1，頁25a-b）就整體的爲學工夫而言，是以通過《四書》、本經和性理書來培養道德，立定「終身之大本」。就學文的工夫而言，則是以讀韓文爲「骨子」。

⁶⁹ 按「骨子」乃宋人常言。其用於詩文批評者，可以從意義的角度指一篇文章的主旨精髓，也可從形式的角度指文章的結構骨架。本質上都是用人體的骨骼爲譬，比喻文章的主幹。《古文關鍵》批點曾鞏〈戰國策目錄序〉中「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云：「此數句蓋一篇骨子綱目」。見〔宋〕呂祖謙輯，〔宋〕蔡文子注：《增注呂文成公古文關鍵》（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2004年《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刻本），卷18，頁5b。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八十〈詩一·綱領〉：「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頁2070）則是用「骨子」喻詩法。

⁷⁰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頁934。又卷二十三〈《論語五·爲政篇·吾十五而有志於學章》〉，記載學生提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工夫」（頁554），也可見以「骨子」喻學的說法在理學士人中的流行。

程》，則明確地在這種承襲關係的基礎上提出了「自韓學下來」的古文工夫。學習歐、曾、王，理據正在他們是學韓之佼佼者，可使學者在韓文的「骨子」之上更得「展開間架之法」。先學韓，次學韓之真傳，再次旁及韓文以外的諸家，正構成了一種「自上而下」的古文學工夫。

《讀書分年日程》在古文工夫論上另一個重要的特點，則是此書將經學、史學之讀書工夫，與學文之讀書工夫統合在一起，使用同一套課程體系加以貫通，事實上就在儒學教育內部進一步確認了文章工夫的地位。理學家的教育觀念，理論上並不主張以科舉為目的，但在現實的層面，儒者的教學活動卻不能不與科舉發生積極的關聯⁷¹。事實上，元代科舉制度之設計，本於朱熹〈學校貢舉私議〉而為之⁷²，理學尤其是朱子之學至此已與科考密切結合；程端禮的《分年日程》，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理學理想與科舉需求相調和的產物。《分年日程》「學作文」部分之上欄，不但備錄「聖朝科制」以介紹考試程式，更特意記述了韓居仁在慶元路敦請史蒙卿，推行朱子〈貢舉私議〉，後來「入為禮部，掌行科舉」，「備殫心力」之事，皆可見理學傳承與科舉制度之結合，如何構成了此書的主要關切點。

不僅如此，作為「工程」之書，《讀書分年日程》具有頗強的操作性，可以為科舉之準備提供極詳切的指導。程端禮不但分年計月地規劃讀書步驟，更建議學子將讀書日程「依序分日，定其節目，寫作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

⁷¹ 魏希德對南宋時期科舉領域「道學課程」(curriculum of Daoxue)如何建立並取得主導地位有精彩的討論。(Hilde De Weerd,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陳雯怡在她關於書院教育史的研究中，也指出南宋書院教學與科舉制度的密切關聯(《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林岩在〈南宋科舉、道學與古文之學——兼論南宋知識話語的分立與合流〉(《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頁14-24。)一文中對科舉、道學、古文在南宋的互動有宏觀的論述。

⁷² 程端禮〈送王季方序〉：「今制本朱子〈貢舉私議〉之意，明經傳註所主、所參、所用，性理、制度、訓詁畢備，一洗漢、唐、宋之陋，非真讀書不足以應之，誠志士千古之一快也。」程端禮：《畏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9冊)，卷4，總頁674下。又〔元〕黃潛〈安陽韓先生墓誌銘〉記述元儒韓性之語：「延祐初，有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多以文法為請。先生語之：『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為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金華黃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23冊]，卷32，總頁414下)。可見元儒樂於稱道當時理學與科舉之結合。

置一簿，以憑用工」⁷³。這種「印板」在《讀書分年日程》卷二末尾附有樣板，名為「刊印日程空眼簿式」，包括〈讀經日程〉〈讀看史日程〉〈讀看文日程〉〈讀作學業日程〉〈小學日程〉等等，其中工夫項目反復滲透，如在〈讀看文日程〉中，仍繼續有「倍讀《四書》經、注、《或問》」「倍讀本經傳注」「溫記《通鑑》」等內容，正可見其謀劃之細密。生徒不但可以用空眼簿記錄程課，自我監督，更可以此供師長檢驗之用——《日程》中建議學生每日填寫簿冊，「次日早於師前試驗，親筆勾銷」，「師復親標所授起止于簿」，如此「日有常守，心力整暇」可收日積月累之功，「依法讀得十餘箇簿，則為大儒也」⁷⁴。這種讀書工夫的規畫，正可以代表理學家面臨現實教育考量之時，認可、接受學文工夫的做法。

規畫、申論讀書之法，在元代儒者之中，程氏並非個例。如劉因(1249-1293)有〈敘學〉一文，詳細闡述他對讀書次第的設想，以為士人讀書當從六經、《語》、《孟》始，六經內部則按照《詩》《書》《禮》《春秋》最後到《易》的順序；經學之後，再治史、讀諸子、學藝。其所謂「藝」包括詩、文、字畫（即書法）三種，所學範圍較程端禮《日程》為寬；其中作文部分云：

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辯，《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闢，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襲塵束，時出而時晦，以為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⁷⁵

劉因對學文工夫的論述，所涉作家範圍更大，諸家之間也沒有明確的次第關係，所采取的更接近轉益多師的路向，與朱熹、呂祖謙之說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關

⁷³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1，頁12b。

⁷⁴ 同前註，卷1，頁12b-13b。

⁷⁵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2004年），第13冊，頁393。

於經學的讀書工夫，劉因之見解亦有別於程朱一路之強調《四書》：

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為大。……世人往往以《語》、《孟》為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為終，學者以是為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⁷⁶

劉氏並不反對讀《論語》、《孟子》，但同時強調由六經之「詳」，返歸《語》、《孟》之「約」，其次第設計與從朱熹一系從《四書》到六經正有微妙的區別。讀書工夫的差異，在經學領域與文章領域正好形成呼應。在文章工夫方面，劉因泛覽眾家，取徑較寬，要求較高，或許不如循序漸進之法更適用於一般士子。〈敘學〉中提到「時出時晦」，暗示劉因所面對的歷史背景，乃是一個文士需要韜光養晦，隱退不仕的時代，其立論或較少考慮科舉實用的因素。

與此不同的是，《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之行世，則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復行科舉之後，因而《日程》對工夫次第的重視，正是其理學讀書法觀念與現實科舉功用兩相適應的產物。與《分年日程》時代相近，又有陳繹曾之《文說》，也以較大篇幅介紹適應科考的讀書之法。《文說》一書，主體是從「養氣」、「抱題」、「明體」、「分間」、「立意」、「用事」、「造語」、「下字」八個方面論述「為文之法」，大抵皆關於文章寫作技巧方面的說明；然在此之後，陳繹曾附論了科舉所用的讀書之法：

繹曾謂：今世為學，不可不隨宜者，科舉之文是也。科舉之文有不得不與朱子語錄參者，謹具于后。⁷⁷

接下來便分述讀《四書》、《尚書》、《詩》、《周易》、《春秋》、《禮記》之法，以及古賦、詔、誥、章、表、策等文章所當選擇的讀本或經典作品。雖然與《讀書分年日程》相比大為簡略，但同樣是貫通讀經與學文兩種工夫而成一整體。在此之後，陳氏又云「此上只科舉所急用如此，若依朱子讀書法，則尚有〈評章答韓莊伯讀書說〉」，引錄了一篇當時流傳於世的「讀書說」文獻⁷⁸。此

⁷⁶ 同前註，頁 388。

⁷⁷ [元]陳繹曾：《文說》（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82 冊），總頁 249 下。

⁷⁸ 同前註，總頁 250 下。〈評章答韓莊伯讀書說〉今未見原本傳世，僅賴陳繹曾之引錄及後人的轉引而存。筆者疑「評章」即「平章」，此文當是某平章政事為答人而作。文中提到《孝經》「近吳草廬先生注詳明矣」，可知出於吳澄《孝經定本》之後。《草廬孝經》（《通志堂經解》本）卷末有「大德癸卯十月」張恆跋語，稱其受業於吳澄，得知此書，於是「借觀舊藁，就欲筆受，請於先生。先生曰：『此往年以訓釋子，不欲傳之，故

文按照「讀諸經」、「讀史」、「讀諸子」、「讀文章」的順序安排讀書進程，在「讀文章」的階段主張精熟《孟子》、韓愈和蘇軾：

讀文章，就今日所宜，且於《孟子》中取長者二十餘章，韓文四、五十篇，蘇文亦然，合成百篇，取時須自己意，擇意中所甚喜者寫入。若覺篇篇可喜，截滿百篇之數即止，不必多貪；若篇篇不見可喜，即不必強取。看終集之後，再轉求之，雖百轉可也。寫成百篇後，讀書之暇，每日隨意多少，反復讀之，或默看，或批點，隨意先窺窺看過，却與分大段，又與細分小節，節段既明，觀其首尾中間相應處、相變處、擊掉處、轉摺處，寬心細目徐觀之。⁷⁹

在具體取法對象上，這份「讀書說」與程端禮、陳繹曾不盡相同，但同樣是將古文工夫融入了整體的讀書學習工夫之中。同時，精擇有限的篇章，抄寫批點，反復研讀，也正是從朱熹、呂祖謙到程端禮都著力提倡的學文方式。從陳繹曾的科舉讀書法與〈評章答韓莊伯讀書說〉這兩份文獻，恰恰可以看到理學家讀書法在元代的不同表現；二者雖然未若《讀書分年日程》一般編排成月日計功，秩序井然的詳細課程計畫，但同樣都是囊括了儒學內部經、史、子、集等不同學問的讀書指南，可以說都是已經超越了「語錄體」而顯現出「工程體」的特徵。由此，宋人關於古文工夫論的種種觀念，至元代被充實、敷演為具有操作性的讀書「工程」，一方面符合理學家的為學理念，一方面也適應科舉考試的現實需求，持續影響著一般士人知識與文學修養的形成。

未嘗示人也。』恆再三請，乃許。既得錄本，而求之者沓來，應之不給，同門諸友共為鋟木以公其傳。」（〔元〕吳澄：《草廬孝經》，收入《通志堂經解》〔臺北：大通書局，1972年，影印康熙十九年刻本〕，第35冊，頁19824）可知吳澄校定之《孝經》，在大德七年癸卯（1303）之後方流傳於世。〈讀書說〉之作在此之後，當是元代的文獻，「平章」疑是元仁宗朝曾任中書平章政事的李孟，延祐復行科舉的推動者。《元史》本傳稱其「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倜儻有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在朝時仁宗與論用人之方，奏稱「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祐二年春開科舉，「命知貢舉及延策進士，為監試官」（宋濂等：《元史》，第13冊，頁4084-4089）。

⁷⁹ 陳繹曾：《文說》，總頁253上。

四、家數與氣象：以作家為中心的文統觀

從宋代到元代，理學家精選熟讀，循序漸進等讀書理念，事實上塑造了一整套修己進學的「工程」；理學在南宋以降對士人精神世界的深遠影響，又使得其讀書工夫論滲透到文學經典的形塑過程之中。這一經典化的過程，正是理學思想、科舉制度與文章寫作諸方面合力的結果。不過，如果回到本文一開頭的問題，在作家、體類、技法等不同的知識框架之中，宋元儒者何以更傾向於以「大家」為框架的古文工夫譜系？前文所言，大抵是從實然的角度加以述論，除此之外，在觀念的層面，以「作家」為中心的習文方法，與理學又存在何種關聯？

以作家為中心，在宋元人常用「家數」這一術語加以概括。程端禮在《讀書分年日程》認為先學韓愈，再學「步驟韓文」的歐、曾、王：

學之則文體純一，庶可望其成一家數文字。⁸⁰

程端禮此處所云「大家數」，正可為「唐宋八大家」之「大家」作確話，不可輕易放過。以前輩「大家」為楷模，最終自己也「成一家數文字」，正是徹上徹下之工夫也。換言之，所謂「大家」，不妨視為「大家數」之簡稱。「家數」之「數」，猶言技藝、技術，乃是強調其文堪為後世之師法。「唐宋八大家」之稱，內裏正不無對文章法度、習學典範的指涉。「大家數」這一術語，在南宋以降的詩文批評中頗為常見。南宋劉克莊(1187-1269)頗好以「大家數」為評詩之術語。《後村集》中，諸如「李、杜雖大家數，使為陶體，則不近矣」；「以大家數掩羣作，以鴻筆兼眾體」；「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意於句律也」等語⁸¹，比比皆是；其所言「大家數」便頗重「師法」這一層含義，如〈江西詩派總序〉便稱歐陽修、蘇軾「巍然為大家數，學者宗焉」，黃庭堅「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自成一家」，「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摩」⁸²。這種以禪宗比喻詩派的方式更可進一步延伸到後世的詩人：

曾茶山贛人，楊誠齋吉人，皆中興大家數。比之禪學，山谷初祖也，呂、

⁸⁰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2，頁9b。

⁸¹ [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趙寺丞和陶詩〉、〈本朝五七言絕句〉、〈詩話·前集〉，《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94，頁4000、4005；卷174，頁6722。

⁸² 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江西詩派總序·黃山谷〉，同前註，卷95，頁4023。

曾南北二宗也，誠齋稍後出，臨濟、德山也。⁸³

換言之，詩中「大家數」，正可比擬為禪中「大宗師」。後村詩中，便常常以「家數」與「宗師」互文，如〈病起十首〉其九云「變風而下世無詩，幼學西崑壯恥爲。老去僅名小家數，向來曾識大宗師」；〈溫故〉云「曩時小家數，歲晚大宗師」皆其例也⁸⁴，可見「大家」或「大家數」這一術語本身蘊含的師法、譜系之色彩。除了詩歌，劉克莊也偶用「大家數」談四六文，其〈方汝玉行卷〉云：「先朝精切則夏英公，高雅則王荊公，南渡後富麗則汪龍溪，典嚴則周平園，其餘大家數尙十數公。」⁸⁵潛在的觀念是每一「家數」背後有其代表性的藝術風格。再往後，「大家數」也被用到古文領域。如南宋林希逸(1193-1271)〈劉侯官文跋〉云「文亦難工矣，雖從前大家數，亦未嘗不磨以歲月而後得之」⁸⁶，所舉的例子便是韓愈、蘇洵兩家。最值得注意的則是元代盧摯〈文章宗旨〉的說法：

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復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爲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夫孰不知？⁸⁷

這一段文字，前稱「大家數」，後云「大家」，正可見元人筆下兩個詞語的換用。盧摯之論文，從六經下及韓、柳，並不僅限於唐宋古文；評論「大家」的方式與前引劉因〈敘學〉一致，都是歸納各「家」在藝術風格上的特點。從論述結構上看，〈敘學〉中的「其文可學矣」正相當於〈文章宗旨〉中的「爲大家」——品第「大家」，目的正是要以之爲法。由此可見，所謂「家數」「大家數」，實際上都蘊含了文章學習中須有宗法、師承統系的觀念。事實上，在師法、統系觀念下形成的「文統」，正可與理學家的「道統」平行觀之，學文有師，學道有統，內在思路，機杼正同。如果從唐宋以降新儒學運動的整體發展考慮，這種同構性自然不難理解。正是在這種觀念背景之下，以「師法」爲核心結

⁸³ 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茶山誠齋詩選〉，同前註，卷97，頁4103。

⁸⁴ 同前註，卷35，頁1864；卷47，頁2437。

⁸⁵ 同前註，卷106，頁4432。

⁸⁶ [宋]林希逸：《竹溪盧齋十一稿續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5冊），卷13，總頁687下。據文末自注，此跋作於「咸淳五年五月」（頁688上）。

⁸⁷ 張健：《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

構的古文習學工夫論，與「大家」之批評術語互為表裏，強化了以「大家」為知識結構的古文經典譜系。

「道統」要求學者觀悟聖賢氣象，「文統」提倡文人體會前輩風骨，內中同樣是以「人」為中心建立師法統緒，變化己身以「成一家」。這種工夫論，主張從整體上把握學者或作家的人格與風格，正出於儒家傳統中「文如其人」的觀念。朱熹云：

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

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⁸⁸

讀得某家文字熟，做出文章便是某家的樣子，正是按「大家」以學文的理論依據。這種古文工夫因「人」及「文」，潛在要求熟悉、理解作家的寫作思路，實際上又與「虛心涵泳」的讀書法相通。更可言者，這種以前輩作家為楷模的觀念，恰好又與理學中「觀聖賢氣象」、「變化氣質」的觀念相合⁸⁹。養氣之說，承孟子而來，在文章與儒學領域都是相當重要的議題。在學道求理的過程中「觀聖賢氣象」，反諸己身以「變化氣質」，事實上都是以「人」作為單位，追求一種整體性的個人修養。有趣的是，「氣象」本身富於審美之屬性，可於言語、文章見之。程頤之言「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下舉《論語·公冶長》中孔門言志之語為例：

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得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⁹⁰

在此，「理會聖賢氣象」正是讀書的重要法門，且是體察聖賢文章的較高境界：「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⁹¹。讀經如此，閱讀古文亦如此，朱熹一方面主張讀《孟子》透，可以變化氣質⁹²；另一方面稱

⁸⁸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139〈論文上〉，頁 3301。

⁸⁹ 理學中「氣象」「變化氣質」對文學中「養氣」、「大家」譜系有相當影響，承兩位審查人提點指示，特申謝忱。有關宋儒的氣象論，可參楊儒賓：〈變化氣質、養氣與觀聖賢氣象〉（《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103-136）的論述。

⁹⁰ 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第 1 冊，頁 284。

⁹¹ 同前註，頁 261。

⁹²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120〈訓門人八〉，頁 2889。

許韓愈「氣象大抵大」，李泰伯文「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⁹³等等，正是以「氣象」論文的例子。此外如樓昉《崇古文訣》批蘇洵〈族譜引〉「可以見忠厚氣象」；元好問推許劉中之古文「典雅雄放，有韓柳氣象」⁹⁴，皆可見古文批評好言氣象的情形。最值得注意的是元人《木天禁語》中特別以「氣象」標目，與篇法、句法、字法、家數、音節並列為「六關」之一。所言又分翰苑、輦轂、山林、出世、偈頌、神仙、儒先、江湖，閭閻，末學等類，乃是按不同類型的人物身分劃分，未附識語云：

已上氣象，各隨人之資稟高下而發，學者以變化氣質，須仗師友所習所讀，以開導佐助，然後能脫去俗近，以游高明。謹之！慎之！⁹⁵

此處對「氣象」的解釋，明顯可以看到理學話語的影響。聖人有聖人之氣象，賢人有賢人之氣象，降及富貴、山林、釋、道諸品人物，亦各有其氣象，此蓋其理論背景也。在所謂「六關」之中，「氣象」是就各類人物而言，「家數」則是具體的作家，兩者關係密切；如「末學」一目下有小字注云「末學者，道聽途說，得一二字面便雜糅用去，不成一家」⁹⁶，可以推知「成一家」則有一家之「氣象」，乃其潛在的觀念。《木天禁語》是論詩，但在理念上又能與論文相通，顯示出理學家「氣象」之說對文章學習的影響。

圍繞「人」以學文，養氣以希賢，除了與理學「變化氣質」之說應若桴鼓，也便於將讀古文與讀經史著作貫通起來。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將韓愈文放到「讀書」部分，繼《四書》、《五經》和《通鑑》之後，已可見之。而陳繹曾在前述《文說》之外，又有《文筌》一書，包括《古文譜》、《楚賦譜》、《詩譜》等部分，細論作文種種法則。其《古文譜》分「文體」、「家數」兩大類論文章之體⁹⁷：

文體	敘事	敘、傳、述、表、譜、記、注
	議論	議、說、辯、喻、跋、彈、狀、書、箴、戒、規、題、奏
	辭令	詔、誥、冊、榜、檄、露布
	右一	一體製，先認本色，次知變化
家法	經	《易》、《書》、《詩》、《春秋》、《禮記》，《論語》，《孟子》
	史	《國語》、《國策》、《史記》、《西漢》

⁹³ 分別見同前註，卷 137〈戰國漢唐諸子〉，頁 3276；卷 139〈論文上〉，頁 3307。

⁹⁴ [金]元好問編：《中州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 4，頁 200「劉左司中」。

⁹⁵ 舊題[元]范德機：《木天禁語》，收入張健：《元代詩法校考》，頁 176。

⁹⁶ 同前註，頁 174。

⁹⁷ 陳繹曾：《文筌》（《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3 冊），總頁 436-443。

子書	《山海經》、《周髀》、《九章》、《素問》、《考工記》、《筦子》、《老子》、《列子》、《莊子》、《荀子》、《穰苴》、《吳起》、《孫子》、《韓非》、《呂覽》、《賈子》、《淮南子》、《新序》、《說苑》、《揚子》、《世說》
總集	《文選》、《古文苑》、《文粹》、《文鑑》
別集	韓文、柳文、宣公文、歐文、荆公文、三蘇文、曾文
	右一一家數，各知其所不同，各知其所以不同，而知其所同，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融化自成一家。各似其似而不摹擬，各變其本而不相錯雜。

《文筌》的記述中，題稱「家法」，總結則云「家數」，亦是同義換用。陳繹曾所謂「家數」，在經、史、子的部分繫以書，在別集部分繫以人；相對於「體製」分類，「家法」或「家數」的框架更易將古文之學習與經學、史學的學習貫通為一整體，成為士人學問修養中「根本」性的部分。呂祖謙云「且讀秦、漢、韓、柳、歐、曾文字，以養根本」⁹⁸，正此之謂也。《讀書分年日程》中，按「家數」學文的過程是古文工夫論中更為根本的環節，背後的原因，也當與「家數」次第更能配合理學家整體的讀書法規劃不無關聯。

「家數」觀念在古文經典形塑過程中的作用，實際上必須放回「體製」（文類）、「技法」與之相為消長的語境中加以考察。同樣是可能存在的譜系方式，「家數」何以獲得相對的優勢？除了考慮道統／文統、氣象等方面與理學觀念的契合，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反過來設問，「體製」與「技法」何以未能獲得與「家數」相同的地位？就「體製」而言，文體的知識本身固是文章學的重要內容，但在科舉制度影響下，各個時代往往在文體上各有側重。宋代常科從北宋初年以詩賦為主，中間經歷反復爭議，漸漸轉為以策論、經義為重，至元代，經義的地位又進一步上升⁹⁹。這種考試文體的變化，對士人教育之取捨輕重，當有直接之影響。論、策、經義這些文體受重視，正可以解釋為何南宋有《十先生奧論》、《論學繩尺》、《止齋論祖》等選本出現。此種文體偏好影響到基礎階段的古文學習，便是對重視議論、敘事的基本寫作手法，對各種應用文體式的關注相對在其次。《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中特別提到鈔讀韓文「敘事、議論

⁹⁸ 呂祖謙：〈與內弟曾德〉，《東萊呂太史別集》，卷10，《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冊，頁502。

⁹⁹ 參見朱迎平：〈科舉文體的演變和宋代散文的議論化〉，《宋文論稿》（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9-40。科舉文體的變遷，是理解宋元人論文之語的關鍵背景；也是考察文體知識在辭章學中地位的重要因素，此一問題承蒙審查人特別提示，對本文幫助甚大。

兩體」¹⁰⁰。這種重視敘事、議論的觀念，也可以在古文選本中得到印證。《古文關鍵》所選，大率便是議論之文¹⁰¹。真德秀《文章正宗》前人多歸為文體分類之選本。事實上，更準確地說，《文章正宗》並非嚴格按照文體分類，「辭命」、「議論」、「敘事」、「詩歌」四大類之下，真氏忽略了諸如序、記、論、策等不同文章體製的差異。例如韓愈的贈序，《文章正宗》將〈送文暢序〉〈贈崔復州序〉〈送董邵南序〉等歸入議論類，而〈送李愿歸盤谷序〉〈贈張童子序〉等則入敘事類，實質上消解了「贈序」本身作為文體的獨立性。元代又有題為虞集所撰的《虞邵庵批點文選心訣》，輯選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六家古文，施以批點，僅有「序」、「記」二體¹⁰²，乃是特別選出唐宋「大家」的兩種文體，作為學習對象。序、記兩體，正是議論、敘事之最具代表性的文體¹⁰³；由此，也不難看到宋元人取法「唐宋八大家」，並不一定要全面地學習研究其所有的文章體製。這種潛在的文體偏好和聚焦，自然也削弱了博觀諸種文體的必要性。尤其在學習的基礎階段，集中閱讀與考試文體關係更近的唐宋經典作品，就比泛覽諸家體製更為迫切。當然，即使在科舉的視野中看，文章體類的知識也不會完全被遺忘；宋代常科之外，尚有詞科，考試制、誥、章表、露布、頌、箴、銘、記等文體，王應麟《辭學指南》即這方面的專書。《讀書分年日程》在以韓愈及唐宋大家作為基礎階段的學文典範之後，也分別介紹了學習史筆、策、經問、經義、古賦、古體制誥章表、四六章表應讀之書。不過，舉業之中，畢竟有主有次，《日程》的介紹以「經義」部分最為詳盡，其他相對簡略，正可見科舉導向的影響。

¹⁰⁰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2，頁3b。

¹⁰¹ 《古文關鍵》所選文體有解、說、論、書、原、議、序等，其中又尤以「論」為多。借用《文章正宗》的分類，這些文體大致都屬於「議論」。而屬於敘事文體的墓誌以及記文皆不獲收入，「碑」只有蘇軾的一篇〈潮州韓文公廟碑〉；「傳」也僅有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和〈梓人傳〉兩篇而已。

¹⁰² 見題〔元〕虞集：《文選心訣》卷首目錄，見宋志英，南江濤選編：《文選研究文獻輯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4冊，頁431-434（按《文選心訣》實乃唐宋古文選本，與《昭明文選》無關）。據弘治三年（1490）鄭時宗為此書重刊本所作序文，稱「是集併李性學文評百許條並梓行于世，蓋亦年久」（同上書，頁435）可知其與宋末元初人李淦（性學先生）的論文之作《文章精義》相輔而行，流行於世，有學文指導書的特色。

¹⁰³ 議論、敘事之分，與序、記之分，並不能完全等同，兩種劃分方式容有交錯，前述《文章正宗》即其例也。

就「技法」而言，南宋以來的古文之學中，本身也積累起了細緻繁複的知識與論說；繁多的文法類別，更可以成爲據以編排文章選本的「知識構架」。如方頤孫《黼藻文章百段錦》按照「遣文格」、「造句格」、「議論格」、「狀情格」、「用事格」、「比方格」、「援引格」、「辯折格」、「說理格」、「粧點格」、「推演格」、「忖度格」、「布置格」、「過度格」、「譬喻格」、「下字格」、「結尾格」十七大類選文，每類之下又分列小類，對篇章字句各個層次的行文技巧有極爲詳細的分析。謝枋得的《文章軌範》，以「放膽」「小心」區分學文的步驟，主張「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小心。由麤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正是將寫作技巧的因素與學習過程的安排結合起來，構建其以「技法」爲中心的古文工夫論。不過，技法的因素常常被不免瑣細、功利之譏。如正德元年(1506)王陽明爲《文章軌範》重刻本作序，就特別強調「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¹⁰⁴。《讀書分年日程》中也批評《源流至論》、《百段錦》等乃是「作成策段，爲舉業資而已」，未足爲「學者所當窮格之事」¹⁰⁵。雖然「舉業」是士人心照不宣的潛在關懷，但「家數」工夫訴諸師古法賢，文如其人，更易與理學之儒同調；「技法」工夫采掇藝巧，不免加重「玩物喪志」之譏，程端禮「窮格之事」的表述，也可以印證前文所論：文章工夫需要被歸入「格物窮理」的理學話語之中，方能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由於「家數」觀念與理學之呼應，這一譜系結構在古文經典化的過程中較占優勢。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文類、技法之因素完全在古文工夫論中消失。事實上，有關的知識和實踐也被吸納容攝到以「家數」爲中心的課程系統之中。《讀書分年日程》在「學作文」之部云：

作科舉文字之法用西山法：讀看近經問文字九日，作一日；讀看近經義文字九日，作一日；讀看古賦九日，作一日；讀看制、誥、章、表九日，作一日；讀看策九日，作一日；作他文皆然。文體既熟，旋增作文日數。大抵作文，辨料、識格在於平日此用剏源戴氏法；及作文之日，得題即放膽此用疊山謝氏法，立定主意，便布置閒架，以平日所見，一筆掃就，却旋改可也。如此則筆力不餒。¹⁰⁶

¹⁰⁴ 見〔宋〕謝枋得：《文章軌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9冊），卷首，總頁543上。

¹⁰⁵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2，頁8a-b。

¹⁰⁶ 同前註，卷2，頁16a-b。

程端禮在此，將真德秀分文體練習的應舉學文法，謝枋得「初要膽大」的學文方法，以及宋末元初戴表元的「辦料」、「識格」的學文法都統合起來，將這些不同的作文「工夫」都融會到其分年日程之中。不過，在《讀書分年日程》的設計之中，幾類不同的古文「工夫」在地位上有著明顯的差別：在時間規畫上，讀經史、韓文等「根本」工夫早於分體練習的「作科舉文字」工夫，更早於在寫作時使用的「放膽」之法；在學習安排方面，專門「作科舉文字」的階段，也要求繼續溫習經書、韓文；可以說在不同層次都顯示出本末之別。換言之，前人以文體分類或是寫作技法為架構的古文工夫論，都被吸收並轉化為程氏讀書法的一部分。而程氏的讀書學文之法，以讀經、讀史、讀文、作文為主幹；讀文、作文部分，又將按「家數」學文的工夫次第作為主幹，主張以韓愈為「骨子」，歐、曾、王為展開，同時旁參柳、蘇等家，形成一套學文的基礎程序，實際上正是強化了「家數」為核心的文章工夫論在古文習學中的優勢地位。

不但如此，《讀書分年日程》在經、史、文章的閱讀規畫中，大多詳細列出應當參考的書籍。如讀韓文，所用的書籍是真德秀《文章正宗》（文本來源）、朱熹《韓文考異》（校勘）和謝枋得批點的韓愈全集（批點方法）；看柳文，先看《文章正宗》，再看其全集；看歐文，則用陳亮所編《歐陽文粹》；「史筆」先讀《文章正宗》和湯漢《妙絕古今》，然後熟看《史記》、《漢書》；「古體制誥章表」讀《文章正宗》辭命類，再選看王安石、曾鞏、蘇軾等人的作品。凡此種種，皆可見「讀書法」類著作如何影響乃至改造了古文選本的閱讀方式。程端禮最重視的古文選本，無疑乃是理學家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然而有趣的是，程氏並沒有遵循《文章正宗》辭命、議論、敘事、詩歌的分類體製來安排其讀文之教程，而是拆取其內容，為我所用，選出議論、敘事兩體，將其融入《日程》嚴密的按家數學文的系統之中，事實上改造了選本本身的結構，使之適應程氏理學讀書法所規限的古文工夫論，按照「家數」次第展開。

五、地域與師傳：讀書學文法在元明之際的流布

從南宋末年至元代，理學的官學化不但使《近思錄》、《朱子語類》等理學家著述成為儒學士大夫的新經典，也使朱熹所倡議的讀書、為學之法逐漸成為士人群體中最具權威性的課程規畫。在元代復興科舉的刺激之下，《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陳繹曾《文說》所載科舉讀書法，以及〈評章答韓莊伯讀書說〉等

讀書法著作紛紛問世，正可見宋儒的讀書理念如何在元代被擴充、推演成爲實踐性的進學「工程」。程端禮之《分年日程》乃是其中體系最完備、論述最詳密，影響後代也最爲深遠的一種。事實上，在端禮生前，《分年日程》已經隨著他在江南多家官學和書院的教學而流布開來。《日程》書末有程氏一條跋尾云：

右《讀書分年日程》，余守此與友朋共讀，歲歲刪修，遂與崇德吳氏義塾、台州路學、平江甫里書院陸氏、池州建德縣學友朋馮彥思所刊，及集慶江東書院友朋，安西、高郵、六合江浙友朋所鈔，及定安劉謙父所刊舊本不同，此則最後刊于家塾本也，覽者儻矜其愚，補其所未及，實深望焉。元統三年十一月朔，程端禮書于甬東之思勉齋。¹⁰⁷

程氏此跋極爲生動地記述了此書在程氏生前便以鈔本、刊本的形式流傳於地方官學、書院以及一般讀書人的交友網絡之中。上引跋尾署元統三年(1333)，則是一個較晚的家塾刻本。而據《日程》卷首所載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序〉末署「延祐二年八月鄭程端禮書於池之建德學」，可知是延祐二年(1315)爲池州建德縣學刊本而作。當時程氏由建德縣學改任集慶路江東書院，臨行時編定此《分年日程》，「以爲學校教法，藏於六經閣」；繼任的掌教馮彥思亦承其志，「以所刊教法訓諸生」，使之皆「知根本是務」¹⁰⁸。此後，程端禮又在信州稼軒書院、鉛山州學任教，其間對《日程》歲歲刪修，當是結合實際教學之經驗不斷調整。至正元年(1341)，程端禮受聘爲明州州學訓導，仍是「以刊定《日程》督諸生學」¹⁰⁹，可見其將讀書日程付諸實踐的情形。不但如此，程氏亦不遺餘力地向其學友推廣此書。端禮弟端學〈送蔣遠靜山長序〉述其兄執教江東書院之事云：

敬叔首設講，爲人敦厚謹畏，終日危坐，與諸生相對，必使熟讀精思、真知實踐，本之晦庵、西山教人之意，酌以今日取士之法，爲書一編以行于世，守其轍者，往往有成。¹¹⁰

此文陳說端禮教學之旨，終篇又謂此後繼任江東書院山長的蔣遠靜「將如蕭規而曹隨，則余不能知之矣」¹¹¹，正不無微意也。至正五年(1345)端禮七十三歲時，

¹⁰⁷ 同前註，卷3，頁59a。

¹⁰⁸ 程端禮：〈送馮彥思序〉，《畏齋集》，卷4，總頁673上一下。

¹⁰⁹ 程端禮：〈送教授鄭君景尹赴浮梁任序〉，同前註，總頁671下。

¹¹⁰ [元]程端學：〈送蔣遠靜山長序〉，《積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2冊），卷3，總頁337上。文中提到蔣遠靜「今其往接余兄之武」云云，可知蔣氏在程端禮之後任江東書院山長。

¹¹¹ 同前註，總頁337下。

馮彥思的弟子高哲臺舜臣與其友忻都舜俞來訪，端禮十分欣喜，不僅回憶了自己早年從史蒙卿受朱子讀書法，與馮彥思相與論學之往事，又「再刪《分年日程》書贈之」，極陳讀書為學之義¹¹²。

《讀書分年日程》問世以後，在知識界也頗受重視。至順三年(1332)十月，永嘉學者李孝光至金陵造訪程氏，便嘆服其法：

始予少時，從臨海方先生學，先生授之子朱子讀書之法，以謂必熟讀精思，而後有以為力行之地。……今年來金陵，聞敬叔氏賢，日往造之，至則見其教弟子，壹用朱子法，善之。候其少休，則坐其弟子而與之言，辯析擊難，皆成誦經傳，而能通其指意，於是益大善之。求其所為立教之法讀之，蓋盡襲朱子、真氏教人讀書之遺言，而別為節度，使粗若可用課覈者。區別精詳，具見條理，為法簡易，補益宏多，於是益恨吾前日之不知讀書也。¹¹³

李孝光對程端禮的讀書教學法十分佩服，不但為《分年日程》一書撰寫序文，更遣其弟子王伯華，使從學於程氏，「悉受讀書節目與說經之書」¹¹⁴。李孝光當時受聘任教於昇州學校¹¹⁵，可以推想，程氏之讀書「工程」在地方官學師生間頗有影響。李氏強調程端禮的教學「壹用朱子法」，又提到自己少時從學，其師亦以朱子讀書法設教，由此正可見程氏《日程》因祖述朱熹而備受儒者推崇的狀況。朱熹的讀書法是理學家教育後學時率多尊奉之典律，而在擴展朱子讀書法的著作之中，《讀書分年日程》又為其中佼佼者，是無怪乎其易於為學者接受了。程端禮在各地書院、學校的教學過程中推行其讀書日程，在當時頗為人所稱道；在他離任二十餘年後，學者回溯江東書院之歷史，猶在追懷「四明程氏敬叔，以考

¹¹² 程端禮：〈送馮彥思序〉，總頁 673 上—674 下。此序題為「送馮彥思」，實際上是在馮氏門人高哲臺舜臣、忻都舜俞過訪離別之時「書以送之」，希望「他日彥思見焉，亦當為之一慨」。序中程端禮又自稱「在江左學校四十餘年」，「職思其憂，以為教之根本，在乎朱子讀書法」（總頁 674 上—下）。

¹¹³ 〔元〕李孝光：〈程敬叔讀書分年日程序〉，見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首，頁 4b-5b。

¹¹⁴ 程端禮〈送王伯華歸永嘉序〉：「余與朋友讀書江東精舍，李季和先生應南臺聘，從其弟子來自永嘉，訓昇學。昇士從之如雲。見余所以為教者，曰：『是用朱子熟讀精思法也，是吾師臨海方先生所以教吾者也！』即遣弟子王生卒業於余，且使悉受讀書節目與說經之書。」（《畏齋集》，卷 4，總頁 666 上）

¹¹⁵ 李孝光〈憶昇州學〉詩序云：「至順三年夏，予在昇州學宮。」（《五峰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5 冊〕，卷 8，總頁 153 上。）

亭讀書法啓誨後覺，文風大振」¹¹⁶。黃潛(1277-1357)有〈跋進學工程〉，盛讚其書¹¹⁷，並稱甫里書院山長陸德原「具刻古靈陳公《製錦管見》及四明程君端禮《進學工程》，凡交游與來學者，人予一帙，曰：觀此亦足爲仕學之法矣。」¹¹⁸陸德原當即上引程端禮跋尾中所云刊刻《日程》的「甫里書院陸氏」，可見執教地方書院的士人對其書的推崇。不僅如此，《讀書分年日程》又經國子監「頒于郡縣學使，以爲學法」¹¹⁹，憑藉官方的提倡，更獲得了跨地域的流行。《至正四明續志》記載四明路儒學收藏之書板，附記有「《讀書分年日程》計板九十片」，「程端禮用朱文公讀書法爲之，板留程氏書塾」，亦可證當時《分年日程》書板在私學與地方官學之間交流利用的情形¹²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初匯集「唐宋八大家」爲一集的朱右，本身乃是由元入明之人，上述元代儒者對「讀書法」的強調，自然對他有所影響。朱右編輯八家古文，乃在元明之際(1360-1368)¹²¹，初名《新編六先生文集》，後稱《唐宋

¹¹⁶ [元]陶安〈送石仲方詩〉序云：「近歲石仲方來長教事，恪恭厥職，剛介不阿，優禮賓師，招徠弟子員……程氏去官二十餘年，獨見石君如此。」（《陶學士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5冊〕，卷2，總頁598上。）

¹¹⁷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總頁301下。

¹¹⁸ 黃潛：〈元故徽州路儒學教授陸君墓誌銘〉，收入〔明〕朱存理：《珊瑚木難》（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影印《適園叢書》本），卷5，頁44a。按：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七亦載此文（總頁473上—474下），然「具刻古靈陳公製」之後闕文，今據《珊瑚木難》本錄之。「具刻」，《珊瑚木難》原文作「具列」，考其文義，當以「刻」爲長。

¹¹⁹ 黃潛：〈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金華黃先生文集》，卷33，總頁430下。文中稱程端禮卒於「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以六年某月某甲子葬陽堂鄉之陶奧」，「葬後二年」，諸門人請銘於黃潛，黃氏「幸嘗辱交于先生，徵于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總頁430下—431上）。可知作於至正八年(1348)。程端禮本傳亦云「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爲學者式。」宋濂等：《元史》，卷190，頁4343。

¹²⁰ [元]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續修四庫全書》第705冊），卷7，總頁575下，現代學界對元代教育史與科舉社會的論述，大也都倚重《讀書分年日程》作爲核心史料，如牧野修二：〈元代の儒學教育——教育課程を中心にして〉（《東洋史研究》第37卷4號〔1979年3月〕，頁536-558）；池小芳：《中國古代小學教育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Neo-Confucian Education," in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eds.,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Wing-tsit Chan and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800-840；三浦秀一：《中國心學の稜線——元朝の知識人と儒道佛三教》（東京：研文出版，2003年）；李弘祺：《學以爲己：傳統中國的教育》等等。

¹²¹ 參見黃強：〈朱右及其《唐宋六家文衡》述考〉。

六家文衡》，所謂「六先生」，乃是以三蘇爲一，實即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八大家¹²²。朱右之祖朱致中，嘗受業於理學家王柏¹²³，家學固有所自；而朱右本人更是在元末至元四、五年間(1338-1339)留居金陵，從游於李孝光¹²⁴，其時正是李氏在金陵訪問程端禮、序《讀書分年日程》(1332)之後不久；以是因緣，接聞於程氏之讀書法，當非異事。洪武九年(1376)春，國子助教貝瓊爲《唐宋六家文衡》作序，云朱右「定六家文衡，因損益東萊呂氏之選，刻諸梓，使子弟讀之」，指出《文衡》作爲「學文」指導讀本的性質。不但如此，朱右主張辭章與理學合一¹²⁵，其生平所編書籍，在《唐宋六家文衡》、《秦漢文衡》等文章選本之外，亦有《書傳發揮》、《春秋傳類編》、《歷代統紀要覽》等經史學習參考書，特別是還有《理性本原》這樣的理學讀本，將〈定性書〉、〈顏子所好何學論〉、〈通書〉等理學家著作匯爲一編，可見其學術傾向¹²⁶。朱右在元末曾任慈溪、蕭山等縣教諭，且有家居、處館

¹²² 朱右〈新編六先生文集序〉：「鄒陽子右編六先生文集，總一十六卷：唐韓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東文二卷，四十三篇；宋歐陽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見五代史者不與；曾南豐文三卷，六十四篇；王荆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蘇文三卷，五十七篇。」〔明〕朱右：《白雲彙》（《續修四庫全書》第1326冊），卷5，總頁268下。

¹²³ 朱右〈贈弟伯良赴隴西縣丞序〉：「先祖春江府君又親受業魯齊王文憲公。先子克紹家學，教養彌篤。」同前註，卷5，總頁276上一下。

¹²⁴ 朱右《白雲彙·檜亭後集序》：「至元重紀戊寅之歲，予如金陵，游從縉紳名人間，考德而問業。」時在元惠宗後至元四年(1338)。又《白雲彙》卷首張天英序：「余始居吳，見伯賢艷宗魯所……是後伯賢復如建業，从李季和游，留歲餘，周覽故都名山大江之盛。」（分別見總頁254下、215下—216上）

¹²⁵ 〔明〕貝瓊〈唐宋六家文衡序〉：「抑嘗聞儒先君子之論，文者務合於道，非徒以其詞高一世爲工也。若六家者雖於道有淺深，皆本諸經爲說，鏗駁而復純，於此求之，其至於古無難者，是伯賢之志也！」乃是卒章顯志，以「文道合一」爲此書之理想。（《清江貝先生集》〔《四部叢刊·初編》〕，卷28，總頁118下）朱右本人爲宋濂所作的〈潛溪大全集序〉中，亦有「工辭章者或昧於理，務直述者或少文致，二者胥失之也」之論，提倡「辭嚴而理闡，氣壯而文腴」（《白雲彙》，卷5，總頁275下）兩相對照，貝氏「伯賢之志」云云，實不誣也。

¹²⁶ 宋濂〈故晉相府長史朱府君墓銘〉：「君善著書，有《春秋傳類編》、《三史鈎玄》、《秦漢文衡》各三卷，《深衣考》、《邾子世家》、《李泌傳》、《歷代統紀要覽》各一卷，《唐宋文》一十七卷，《漢魏詩》四卷，《元史補遺》十一卷。又爲《元史編年》未成。其雜著文有《白雲彙》十二卷行于世。」（收入朱存理：《珊瑚木難》，卷5，頁38b）可知朱右著述之大要。檢宋濂《宋學士文集》，未見此墓銘，《珊瑚木難》所收錄的版本篇末署「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將仕郎前國子助教金華鄭濤篆額」，或許是根據墓碑實物抄錄。在這些著作中，很多屬於彙編讀本性質。朱右《白雲稿》卷五有〈書傳發揮序〉、〈理性本原序〉、〈歷代統紀要覽

授徒的經歷¹²⁷，這些現實因緣，與其編纂經、史、理學、文章讀本不無關聯。將朱右所編的古文選本放到這個大背景下審視，正可以看到，古文之習學，本身屬於經史、理學等各類知識構成的一整套「道問學」系統的一部分。

不但如此，《讀書分年日程》還被多種書籍節鈔轉引，流通於士大夫的知識世界之中。如元代的日用類書《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在甲集「爲學」類中即錄有「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法」，簡要撮述其歷年工程之大要¹²⁸。明初趙搗謙所編輯的學習指導書《學範》，也大量引錄《讀書分年日程》。此書乃是「彙集先儒議論所長，而間斷以己意」¹²⁹，其卷上「讀範」部分按照性理、小學、經、史、子、集之次第規劃讀書程序，主要便是採用程端禮、陳繹曾等前代學者之說，指點讀書門徑與方法；在工夫結構與具體論述方面都明顯可以見到程氏之影響。降及明清兩代，不但朱熹讀書法被學者奉爲圭臬，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也成爲官私學校、書院、家塾中訓課生徒時最爲常用的指南；而類似的讀書、作文法之書籍亦層出不窮。如明清之際陸世儀在其《思辨錄》中以「十年誦讀」「十年講貫」「十年涉獵」爲序安排讀書之法，主張「學有漸次，書分緩急，則庶幾學者可由此而程功」¹³⁰。康熙間唐彪《讀書作文譜》分讀書、作文兩大部分詳細介紹研治之法，也是繼承《分年日程》的思路而來¹³¹。清儒陸隴其推崇《程

序》，可以大致瞭解諸書之內容。

- ¹²⁷ [明]陶凱〈故晉相府長史朱公行狀〉：「公幼聰敏，學知向方，父母所鍾愛，家雖貧，鬻產以教之。既長，博通羣書，後以《書經》應進士舉，不得志，遂刻意爲歌詩文詞，動以古人爲法。閒嘗游金陵，南臺監察御史趙承禧舉才堪校官，浙東帥閻檄授慶元路慈溪縣儒學教諭，能善于其職，人至今猶稱之。……居二十年……奉母入越，授徒爲養。……又徙居上虞五大夫里，調紹興蕭山縣儒學教諭。江浙行省丞相察里公承制擢公爲其縣主簿。……公學益力，造詣益深，名聲日蔚然以起，海昌馬氏延公教其子。」見朱存理：《珊瑚木難》，卷5，頁34b-35b。
- ¹²⁸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61冊），頁15。同書亦收入「朱子讀書法」、「歐陽文忠公讀書法」、「朱子論作文」、「東坡論作文法」、「山谷論作文法」、「呂居仁論文法」等等。
- ¹²⁹ [明]王惠：〈刻學範叙錄〉，見[明]趙搗謙《學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21冊），卷首，總頁312下。又同書載[明]鄭真〈學範序〉，云：「搗謙《學範》，與《日程》相表裏。」（總頁313上）
- ¹³⁰ [清]陸世儀著，[清]張伯行重訂：《思辨錄輯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正誼堂全書》本），卷4，頁3b-6a
- ¹³¹ [清]唐彪著，羅立剛點校：《讀書作文譜》，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第4冊，頁3381-3588。

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嘗刊刻之分贈親友¹³²,更在直隸靈壽知縣任上將此書印付直隸學院生徒,要求諸生「依程氏分年讀書日程,肆力於經史」,「庶幾學有本原而真才可出」¹³³。乾隆七年(1742),江西巡撫陳宏謀將《讀書分年日程》收入其《養正遺規》之補編,刊行推廣¹³⁴。依託於讀書法的流行,以作家為中心,以結構法度為主要內容,以批點圈抹為技術手段的古文工夫論,在一般士人的教育過程中獲得了重要的地位。這一重因緣,對於宋元以降「唐宋八大家」文統的醞釀和形成,實有重要意義。「讀書法」不但可與古文選本相互配合,更清楚地顯示了選本所構築的文章典範如何在實際的學習過程中開展推演,甚至還可以「改造」以文體、作法為次第的選本,更加強化以作家為主幹的文章統系。宋元以來理學影響下的古文「工夫論」,在明清時期持續流行,並經由日用類書、通俗手冊等大衆讀物的編輯刊印,在一般士人中得到更廣泛的傳播,是為「八大家」經典譜系不斷強化的內在動力。

六、結語：理學與辭章

宋代理學興起以後,「道」與「文」之間的緊張關係便成為中國文學史與思想史上的一個核心問題。表面上看,理學家強調道德修養、性理體認,對於辭章一道,則以「作文害道」的態度貶抑之;然而在另一方面,辭章本身在學術著作乃至日常交際中的表達功能,尤其是以試文為重心的科舉取士制度,使得文章寫作的學習與訓練,巋然自立於士大夫的學問世界之中。理學與文章,本身自然是兩種殊途的學問系統,在古人已有「道學」、「文苑」之明確區劃,現代學界往往也會用「理學家」與「古文家」的分判作為考察宋元、明清文學史的一個知識

¹³² 關於《讀書分年日程》在清代學者中的影響,徐雁平:《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中編,第一章第三節(頁353-382)有詳細討論,可參看拙作:〈詞章如何成學:姚鼐與清前中期書院的古文教育〉(收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編:《明清研究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23-170)亦涉及到《日程》對清代古文家的影響,並認為姚鼐分體「類纂」古文,乃是對唐宋古文譜系的新變。

¹³³ [清]陸隴其:〈申直隸學院文·又〉,《三魚堂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集》第117冊),卷5,總頁570下。

¹³⁴ [清]陳宏謀編:《五種遺規》(《續修四庫全書》第951冊),總頁34上—41上。

框架¹³⁵。本文希望補充的，則是這幅二分圖景的另一面向——在古文經典的形塑之中，理學的觀念與實踐，事實上也與之密切糾纏。強調熟讀精思和先後次序的讀書法，本身有韓愈、歐陽修、黃庭堅等人作文工夫論的淵源，經過理學家的整理轉化，成爲一套涵蓋經、史、性理、文章等不同部類知識的進學工程，不斷強化了以「家數」爲中心的古文工夫論，在「唐宋八大家」這一古文經典譜系的形成中厥功甚偉。在這一轉化與交互滲透的過程中，尤以朱熹的影響至關重要。朱子一方面取用文章家之習學論述，另一方面以更精醇的理學思想系統將其整合重組；正是由於朱學在後世儒學與科舉領域強大而持續的影響，他有關讀書工夫的論述既經由《朱子語類》、《性理大全》等理學書籍不斷流行，又經過元代儒者如程端禮、陳繹曾等人將其「工程化」的實踐，滲透到士人的教育傳統之中。這個吸收、轉化、超越、反饋的過程，正可見除了偏重「內容」的「文以載道」，在更偏「形式」的文章法度和文學經典構成方面，理學與辭章同樣存在很深入的互動關係。梳理、探討這種互動在觀念和實踐兩個層面的歷史脈絡，並不是要將文學的發展簡單地視爲思想或意識形態的附庸，而是希望還原文學承傳、經典閱讀的歷史語境，探索「文學」如何成爲更廣義的學術文化、思想意識或者知識形態的有機組成部分；較爲抽象、主觀的審美意識，又是如何在具體的社會現實中漸次展開。正如包弼德在《斯文》中所言：「哲學史並不總是代表思想文化的歷史，或者能充分地描述和解釋我們借以建立共同價值觀 (shared values) 的方式」¹³⁶。因而在思想史的研究，重視文學之地位就顯得十分必要。反過來，文學史的研究，也正有待於融通哲學思想、教育制度、社會文化等不同的領域，開展跨學科、多層面的考察，探討文學觀念如何與士人的生活實踐相結合。由此，今人方可對古典中國的知識、思想與文學世界，對理學、經學、古文之學等不同學術部類的複雜交涉，獲得更爲親切而深入的認知。

¹³⁵ 如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1948年）；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附論了宋代「古文家與理學家的交涉」；馬積高《宋明理學與文學》（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也以理學家、古文家對立的框架來探討南宋、元代及明前期的文學史。

¹³⁶ Peter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6: "...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does not always represent the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culture or adequately describe and account for the ways we establish shared values." 參包弼德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6。

宋元理學家讀書法與「唐宋八大家」 的經典化

胡 琦

宋元以迄明清，唐宋古文統緒逐漸形成，成為古典散文寫作之大宗。相對於唐前《文選》為代表、按體類編排的文章正典，唐宋古文正典轉向了一個以「大家」為中心的譜系。這一變化何以發生？古文正典為何選擇了按作家詮次，而不是以文體或技法作為其分類原則？已有的研究對此問題關注不多。本文希望由此切入，探討古文經典化過程與理學思想、科舉教育等因素的互動關係。宋元以降，理學家發展出一套細密而富有實踐性的讀書工夫論，強調精思熟讀和為學次第；「唐宋八大家」之經典化，正是在理學工夫論的影響之下，形成以作家為中心的縱向譜系，循序漸進地展開學文課程。讀書作文之實踐工夫，在元明時期更藉由書院教育和科舉指南的刊刻流布而蓬勃發展。理學家讀書法用一套整體的學習規畫，貫穿了經學與古文經典，塑造了近世中國一般士人的知識世界。

關鍵詞：古文 理學 讀書法 經典化

The Ladder of Learning: Neo-Confucianists' Art of Read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se Canon in Fourteenth to Sixteenth Century China

HU Qi

“The Eight Masters of the Tang and Song” constitute the canonical genealogy of prose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Recent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the origins of this genealogy and clearly delineated the early stages of its canonization. However, little work has been done on the formation of this canon. How were the masterpieces categorized? Why were they put into such an order? Compared with the old canon of the *Wenxuan*, which organized literary works according to various genres, this new canon of *guwen* prose organized its material by author. What made this transition possible?

In this paper, I demonstrate that the masters-oriented prose canon was actually an embodiment of the Neo-Confucian learning process, which insisted upon the intensive study of a limited set of paragons. A new genre of study guides, referred to collectively as “the art of reading” books, was created to integrate training in prose writing and the process of reading classics as a holistic program of education, aimed at both moral cultivation and success i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t did not take long for this program to find popularity among elites in the fourtee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thanks to the printing press and the network of local academie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literary criticism and social histor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o-Confucian reading guid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se canon, and to shed new light upon the study of canonization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guwen* Neo-Confucianism the art of reading canonization

徵引書目

- 王十朋：《梅溪先生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
- 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70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 王正德著，王宜瑗點校：《餘師錄》，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 王柏：《魯齋王文憲公文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3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 王雪卿：《靜坐、讀書與身體：理學工夫論之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5 年。
- 王應麟編：《玉海》，臺北：台灣華文書局，1964 年。
- 付瓊：《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考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
- 包弼德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 年。
- 永瑆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 朱右：《白雲稟》，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朱存理：《珊瑚木難》，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6 年。
- 朱迎平：《宋文論稟》，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
-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 ____：《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
- 池小芳：《中國古代小學教育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年。
-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68-1969 年。
- 佐野公治著，張文朝、莊兵譯，林慶彰校訂：《《四書》學史的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5 年。
- 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2 年。
-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 年。
- 吳承學：〈評點之興——文學評點的形成和南宋的詩文評點〉，《文學評論》1995 年第 1 期，頁 24-33。
- 吳澄：《草廬孝經》，收入《通志堂經解》第 35 冊，臺北：大通書局，1972 年。
- 呂祖謙輯，蔡文子注：《增注呂文成公古文關鍵》，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
- ____撰，王宜瑗點校：《古文關鍵·看古文要法》，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 ____：《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年。

-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李弘祺：《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
- 李孝光：《五峰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2004年。
- 貝瓊：《清江貝先生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
-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61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
- 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林岩：〈南宋科舉、道學與古文之學——兼論南宋知識話語的分立與合流〉，《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頁14-24。
- 林素芬：〈呂祖謙的辭章之學與古文運動〉，《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8卷第2期，1995年12月，頁145-161。
- 柳宗元：《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胡琦：〈詞章如何成學：姚鼐與清前中期書院的古文教育〉，收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編：《明清研究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范德機：《木天禁語》，收入張健：《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茅坤編，茅閻叔重訂：《唐宋八大家文鈔》（萬曆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線上電子掃描版，網址：[https://iif.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8187042\\$1i](https://iif.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8187042$1i)，檢索日期：2018年3月14日。
- 唐順之：《文編》（嘉靖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線上電子掃描版，網址：[https://iif.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9554455\\$1i](https://iif.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9554455$1i)，檢索日期：2018年3月14日。
- 唐標著，羅立剛點校：《讀書作文譜》，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徐雁平：《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 馬積高：《宋明理學與文學》，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 高步瀛選注：《唐宋文學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高津孝著，潘世聖等譯：《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張洪、齊熙編：《朱子讀書法》，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張素卿：〈「評點」的解釋類型——從儒者標抹讀經到經書評點的側面考察〉，收入鄭古雄等主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
- 張健：《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____：《知識與抒情：宋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____：〈朱子的文章論〉，2018年3月16-17日於香港：嶺南大學「『文章學理論與批評實

踐』暨『史漢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上卷）/1947年（下卷）。
- _____：《宋詩話輯佚》，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陳立勝：《「身體」與「詮釋」——宋明儒學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 陳宏謀編：《五種遺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5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
- 陳淳：《北溪大全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陳善：《捫蝨新話》，收入《儒學警悟》，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1輯，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 陳雯怡：《從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
- 陳鵠著，鄭世剛點校：《西塘集耆舊續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陳繹曾：：《文說》，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_____《文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1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陶安：《陶學士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陸世儀著，張伯行重訂：《思辨錄輯要》，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
- 陸隴其：《三魚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程端學：《積齋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四部叢刊·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
- _____：《畏齋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_____：《思舊錄》，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26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黃強：〈朱右及其《唐宋六家文衡》述考〉，《文學遺產》2001年第6期，頁131-134。
-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楊儒賓：〈變化氣質、養氣與觀聖賢氣象〉，《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6月，

頁 103-136。

- ____、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
- 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 虞集：《文選心訣》，收入宋志英、南江濤選編：《文選研究文獻編輯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年。
- 趙撝謙編：《學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21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 年。
- 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 魯迅：《集外集》，《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 錢穆：《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 年。
- 謝枋得編：《文章軌範》，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選本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
- 鍾彩鈞：〈朱子學派尊德性道問學問題研究〉，收入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3 年。
- 韓滄著，孫菊園點校：《澗泉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 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 羅書華：〈從文道到意法：呂祖謙與散文學史的重要轉折——兼說《古文關鍵》之「關鍵」的含義〉，《中國文學研究》2013 年第 3 期，頁 72-76&97。
- 三浦秀一：《中國心學の稜線——元朝の知識人と儒道佛三教》，東京：研文出版，2003 年。
- 牧野修二：〈元代の儒學教育——教育課程を中心にして〉，《東洋史研究》第 37 卷第 4 號，1979 年 3 月，頁 536-558。
- Bol, Peter.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Dai, Lianbin. *Books, Reading and Knowledge in Ming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2.
-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Chu Hsi's Aims as an Educator." 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Ed. by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 John W. Chaffe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 "Neo-Confucian Education." In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Ed. by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Wing-tsit Chan and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De Weerd, Hilde.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